

「城隍」之外——外城隍廟研究

張傳勇*

傳統觀念認為，城隍神不論作為城市守護神還是冥官，都應建廟於城牆之內，因之，建於城外者，往往被視為奇異。但在實際的建置當中，城隍廟與城牆並沒有如此緊密的聯繫。建在帶牆城市中的城隍廟，僅是唐宋以來城隍廟建置諸側面中的一種。利用以方志為主的歷史文獻，從更大地域範圍進行考察，外城隍廟就會呈現出多元的變化過程或解釋。本文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外廟在歷史時期的狀況。作為中國傳統城市形態主要構成要素的城隍廟，其分佈形態的歷史與傳統時期築城史雖然密不可分，沒有城，外廟無從談起；城池的變動，也是導致外廟出現或終結的一大因素。但城池的變動並不必然影響到外廟。更重要的是，相比於城池，外廟的數量相對較少。因此，如果說城池的修築可能存在階段性的變化，就外廟而言，個別地區能夠或多或少反映出地方社會的變動。但總體來說，很難尋到這些現象中的規律性。

關鍵詞：城牆 城隍廟 城市守護神 冥官

*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暨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項目「中國城隍信仰研究」最終成果之一，項目編號：10YJC730014。

城隍廟與帶牆聚落空間的關係，是學者感興趣的問題之一。有學者初步考察了城隍廟在城牆空間內的位置，認為城隍廟的建置方位具有一定傾向性，是城隍信仰基本觀念的反映。¹ 本文關注城牆之外的城隍廟，考察這樣一種被認為稀見而奇怪的現象背後，反映出怎樣的信仰觀念。

作為一般性認識，城隍神是中國傳統時代城市守護神，² 理應居於城內；唐宋以來，城隍神又身兼冥官之責，其廟宇也被視為陰間衙署，以此，陽世衙署通常建於城內，城隍廟也不應在城外建造。事實上，城隍廟因故建於城外的現象，並不少見。這類城隍廟，本文稱其為「外城隍廟」，簡稱「外廟」。³ 對於外城隍廟，古往今來，人們因為好奇而留下許多解釋外廟由來的「攆城隍·遷廟型」故事。現代學術研究關注外廟，首先從這些故事開始，由民間文學角度對遷廟故事的解讀，也成為外廟研究的重要方面。⁴ 而從史料入手的史實性探討則較為少

¹ 筆者所見，劉景純對清代黃土高原地區城鎮城隍廟的空間分佈作了統計分析，見劉景純，〈清代黃土高原地區城鎮宗教祭祀景觀的分佈特徵〉，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編，《歷史環境與文明演進——2004年歷史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頁276-277。

² 就「城隍」字義而論，城指城牆，隍指護城溝壕。《說文》：「隍，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後世多不拘泥於「池」「隍」之別，徑將「城隍」解作「城池」，「城隍神」亦釋為「城池之神」。例見明《諸司職掌·兵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史部748，據國家圖書館藏明刻本影印），頁717；弘治《徽州府志》卷五，〈祀典·祠廟〉，頁33b。按：方志類出版資訊請參引用書目，謹此說明。

³ 明清以來即有「外城隍廟」或「外廟」之稱，常見的情形是，在城內業已建有城隍廟的情況下，人們往往將建於城外者加「外」字，以示區別。如山東青州府「外廟」、廣西田州「外城隍」、廣西明江「外城隍廟」、山東臨朐「外城隍廟」等（青州府、田州之例，見後文。餘見光緒《寧明州志》卷上，〈建置紀·祠廟〉，頁44b；民國《臨朐續志》卷八，〈建置略〉，頁18a）。其中一些外廟與治所之間的關係，並不確定。顯然，這與本文所用「外城隍廟」所涵蓋的範圍有所不同，謹此說明。

⁴ 有關的外廟故事，隨著一九八〇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地區民間文學「三套集成」的編纂與陸續出版，為外廟所在區域以外的人群所知，成為最初的研究中反覆引用的材料。被提及較多的是湖北興國、天津靜海、浙江瑞安等地。從民間文學角度所做的較為嚴肅的研究，最先有顧希佳在實地調查浙江蕭山東門外五里「小城隍廟」基礎上對外廟現象的初步探討（〈浙江蕭山小城隍廟考〉，《民俗曲藝》114〔1998〕：59-82。又與濱島敦俊合作，以〈浙江省蕭山縣小城隍廟調查報告——城隍廟覺書（一）〉為題，刊於《大阪大學文學部紀要》39〔1999〕：47-74。後者收入濱島敦俊著，朱海濱譯，《明清江南農村社會與民間信仰》〔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頁305-329。據該文「前言」，顧氏的調查係受濱島的指導與委託）。但所謂「小城隍廟」與本文所論外廟不盡相同，小城隍廟之稱是以城內存在「正宗」官祀城隍廟為前提的。顧氏又有〈「攆城隍型」故事的比較研究〉

見，⁵ 研究所涉及的個案非常有限。總體而言，研究的深度與廣度仍有待提升。有鑒於此，本文將從更為廣闊的區域入手，主要依據歷史文獻，對傳統時期的外城隍廟問題作出更為全面、深入的探討。

本研究為建立於個案研究基礎之上的統計分析，因此，要對外城隍廟的標準即何為外城隍廟作一說明，並檢討本文所用資料，以使外城隍廟的統計具有一定可信度。在此基礎上，考察外城隍廟的時空分佈，進而探討其成因以及人們的觀感。由於統計是本研究的重要基礎，且確認一座外城隍廟並非易事，故不嫌繁瑣，製表列於文後，希望為後續研究提供些許參考。

一·何處是城外？

外城隍廟的存在以城牆的建置為前提。一般而言，城牆是傳統行政治所的重要標誌，但城牆又非行政治所獨有。除軍事城堡外，宋代以來，尤其明清時期，州縣以下以鎮為代表的聚落建置城牆的情形，並不少見。就非治所帶牆聚落而言，當然也有內外之別，不過，考慮到此類建築及相關外廟的資料相對缺乏，本文的討論，如無說明，主要圍繞治城展開。

封閉性的城牆將城市區隔為內外兩個空間，城牆之外即城外，自不待言。不過，尚需追問：城牆之外，範圍有多大？是指城外關廂之地，還是大到涵蓋了關廂之外與治城相關的鄉村地區？傳統城市所建城牆，具有分割的作用，將不同的居民群體區隔開來，形成「城內」與「城外」的分野，城外不僅包括附郭的城市街區，還包括廣大鄉村地區。明人趙峒（約 1560-1630，陝西盩厔人）《石墨鐫華》著錄〈唐縉雲縣城隍廟記〉有云：

一文，勾勒了「攆城隍·遷廟型」故事群的演變軌跡，並簡要分析故事形成的文化背景及其思想內涵（刊《杭州師範學院學報》2000.5：99-103，後經充實，以〈凡夫俗子攆城隍——「攆城隍」故事解析〉為題，收入劉守華主編，《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 272-287）。孟文筠〈明代以來城隍故事與信仰〉也有一定篇幅論及城隍遷廟故事（花蓮：花蓮師範學院民間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 105-110）。還有眾多城隍研究論著，凡提及外城隍廟，多會費些筆墨，說明其建置之特殊性。不再例舉。

⁵ 張傳勇〈明清山東城隍廟「異例」考〉一文將「外城隍廟」作為城隍廟建置類型中的「異例」，放置於明清時期的山東地區，作了簡要考述。載《聊城大學學報》2004.6：48-54。

〈記〉云「自西谷遷廟於山巔」。又以見城隍廟，前朝不必在城中也。今西安府西村落，大者多有城隍，是其遺意。⁶

趙嶠由「自西谷遷廟於山巔」一句，想當然地認為，城隍廟所遷之山巔當在城外，由此聯想到家鄉關中大村落也建有城隍廟的情形。顯示兩者的共同點在於，都是建於治城之外。⁷ 這就說明，至少在趙嶠看來，與「城中」對應的，是城牆之外包括了所轄鄉村的廣大地區。亦即，村鎮城隍廟也是建於城外的城隍廟。如後文所見，有些地方也習慣將村鎮城隍廟與本地州縣扯上關係，解釋為何城隍廟建在沒有衙門的村鎮。不過，這與本文所探討的外城隍廟不同。暫置不論。

建於城外的城隍廟，如與本城無關，也不在考察之列。即如福建莆田城南門外有所謂「浙江城隍廟」，民國《莆田縣志》稱，因南宋景炎元年（1276）少帝駐蹕莆田，「邑人立廟以示不忘故都，不止把杭州作汴州之痛也」。⁸ 實際原因可能並非如此，但已難以考究。浙江蕭山東門外五里舊有城隍廟，學者將其作為「小城隍廟」的一種，與外城隍廟相提並論，⁹ 但沒有證據顯示該廟與蕭山縣城有何關聯。

城牆區隔出城之內外，但中國傳統城池往往並非祇是一個單線環圈結構，城門外多有建置郭城、甕城、月城（明清時期有稱子城者）的現象。其中空間，到底是城內還是城外？此問題似未有專論。筆者所見，有將其作為城外的情形。澄城縣城隍廟建於唐貞元十三年（797），元後至元四年（1338）重修，縣尉劉宏遠記謂：「縣城之西，關廂之右，古廟存焉。廟之初基不可考。」¹⁰ 位置或為城外靠近西城門之地。明嘉靖三十年（1551）刊《澄城縣志》明確記載，「城隍廟在縣治西門外」，基址沿唐之舊；並記縣城：土城方三里有奇，建築莫知所始，正統、景泰、弘治中重修，嘉靖己酉（1549）建四郭門。¹¹ 據後修邑志，隍廟正在

⁶ 趙嶠，《石墨鐫華》（收入《知不足齋叢書》，乾隆三十九年〔1774〕刻本），卷四，頁8a。

⁷ 明清時期陝西村鎮城隍廟的情形，參看張傳勇，〈明清陝西城隍考——堡寨與村鎮城隍廟的建置〉，常建華主編，《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11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頁62-83。

⁸ 民國《莆田縣志》卷一八，〈建設志〉，頁51a。

⁹ 前揭顧希佳，〈浙江蕭山小城隍廟考〉；濱島敦俊、顧希佳，〈浙江省蕭山縣小城隍廟調查報告〉。

¹⁰ 咸豐《澄城縣志》卷二一，〈金石下〉，頁17b。

¹¹ 嘉靖《澄城縣志》卷一，〈祠祀志·祠廟〉，頁18b；〈建置志·城池〉，頁12b-13a。

「西郭」內，且多記該廟「在西門外」。¹² 乾隆甲申（1764），重修城隍廟告成，知縣額樂春有記，對其方位有如下一番議論：「余惟城隍義取禦外而衛內，立廟以妥其神，載在祀典。然他縣皆建諸城中，而澄城獨在城外。」¹³ 這就說明，處於澄城西郭內的城隍廟，與未建郭門前一樣，都是一座外廟。再如，鳳翔府附郭鳳翔縣的城隍廟，位於周圍六里的東郭城內，乾隆《鳳翔縣志》將這一位置記為「城外東關」。¹⁴

對於一些空間較大的羅城（或外城），也有地方文獻將其中空間視為城外。廣西平南縣，洪武初築土城，景泰間毀，天順間始築磚城，周三百六十二丈，弘治七年（1494）築羅城，計五百丈。¹⁵ 據萬曆間《殿粵要纂·平南縣圖》，羅城圍東西北三面，南面以河為限。¹⁶ 城隍廟建於洪武七年（1374），位置在羅城內臨河之地。對於這一位置，嘉靖《廣西通志》稱為「在城外」。¹⁷ 入清，羅城盡圮。各級志書更將廟址記為「城外西街」、「城外右廂」。¹⁸

從以上的敘述看，所謂「城內」、「城外」，往往是以衙署所在的具有主體性的城牆作為參照，其外空間，不論是較小的關廂，還是較大的羅城，都以城外視之。不過，由於本文接觸的個案總體而言較為有限，而且所涉及的個案多由方志一類文獻透露出來，所以不能推定這種認識具有普遍性。除澄城城隍廟外，其他處在郭城、羅城中的城隍廟，本文均以「疑似」外廟視之。

在傳統城市建置史上，還存在一種不太多見的情形。通常情況下，附郭縣與府同城而治，但也有附郭縣另外建城，與府城形成複式城，為人所知的如鳳陽府與附郭臨淮縣、惠州府與附郭歸善縣等。¹⁹ 岳陽府附郭巴陵縣的建置，尤為獨特。作為首縣，巴陵於洪武初建後即位於府城南門外，城隍廟也於明初建於縣治

¹² 現存順治、乾隆、咸豐間所修邑志所述悉同。民國《澄城縣附志》卷二，〈建置志·祠廟〉，頁4則在「祠廟之在城內者」後，記「祠廟之附於郭者」，其在西郭者，首列城隍廟。也是說明城隍廟不在城內。

¹³ 乾隆《澄城縣志》卷六，〈廟屬七上〉，頁2b-3a。

¹⁴ 乾隆《鳳翔縣志》卷二，〈建置志〉，頁37b。

¹⁵ 道光《平南縣志》卷六，〈建置志〉，頁1a-b。

¹⁶ 楊芳等纂修，《殿粵要纂》卷三，頁4前。

¹⁷ 嘉靖《廣西通志》卷三四，〈壇廟下〉，頁16a。

¹⁸ 除乾隆《潯州府志》卷一一，〈祠祀志〉，頁7a記為「縣治西」之外，其餘各級志書均指其為城外，不再例舉。

¹⁹ 有關複式城市的問題，參見章生道，〈城治的形態與結構研究〉，施堅雅主編，葉光庭等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101-102。

東百六十步之外。²⁰ 直到弘治四年 (1491)，環縣治築「土城」，周一里有奇。²¹ 以隍廟與縣治距離計算，似不當在城中。但不能確知。顯然，雖為首縣，在縣署主要機構建於府城外的情況下，隍廟對於無城牆圍繞的縣治，並無內外可言。待巴陵縣署於康熙五年 (1666) 遷入郡城，判別邑廟內外屬性的參照物則應隨之改變。與上述情形極為相似的是，有一些建於村鎮的城隍廟，被認為本因邑治而建，在治所遷入郡城附郭後，仍作為邑廟長期存在。²² 如安慶府附郭懷寧縣山口鎮城隍廟，志書稱山口鎮為唐皖陽縣址，鎮廟在嘉慶二十四年 (1819) 前一直作為懷寧縣廟。²³ 就其與邑治所在城池的關係而言，如後文所見，雖然可能存在解釋其由來的遷廟型故事，但不當以外廟視之。

上文所謂關廂（郭）是與城市中心相對而言的，往往指涉城門內外的區域。不管如何，建於城關某一方位的城隍廟，到底是在城內還是城外，因地而異。單從文字表述，並不容易判斷。同治《茶陵州志》記「城隍廟在城北關」。²⁴ 觀該志〈州城圖〉，廟在城內東北隅。僊遊城隍廟建於城內，乾隆《僊遊縣志》記為「在西關內」。²⁵ 這是以關為城內者。以關為城外者，嵩縣城隍廟，方志均謂「在西關」。觀乾隆《嵩縣志》卷首載圖，廟在西城外。又據該志載城垣：洪武三年 (1370) 改築，「就東北一隅結磚為城。遺學宮西門外」。後屢有興築，格局不改。²⁶ 城隍廟更在文廟之西，則在城外無疑。滋陽縣城隍廟舊在東城外，康熙《滋陽縣志》記為「在東關龍王廟左」。²⁷

以上是就城市明確建有城牆的情況下所作的探討。傳統中國的城市並不總是建有城牆的，一些城市因為沒有必要，或受政令影響，在某些時段是沒有城牆的。尤其唐至明中葉，實行整體或局部的不重視修城政策，任由城牆隳圮。²⁸ 在

²⁰ 光緒《巴陵縣志》卷八，〈建置志〉，頁 6a；城隍廟在鎮署東百六十步，鎮署即舊縣署地。隆慶《岳州府志》卷九，〈秩祀考〉，頁 29a：「巴陵縣城隍廟，故祠在今祠左。知縣滿江毀東嶽廟遷之。」滿江，嘉靖中任。

²¹ 光緒《巴陵縣志》卷八，〈建置志〉，頁 3a，引《讀史方輿紀要》。

²² 有關附郭城隍廟的建置問題，見張傳勇，〈附郭城隍廟考〉，《世界宗教研究》2006.1：63-71。

²³ 康熙《安慶府志》卷四，〈古跡〉，頁 75b；道光《懷寧縣志》卷一一，〈祠祭〉，頁 13a-b。

²⁴ 同治《茶陵州志》卷一一，〈祀典〉，頁 23a；卷一，〈圖繪〉，頁 3b。

²⁵ 乾隆《僊遊縣志》卷一二，〈建置志·壇廟〉，頁 4a；卷首，〈城池之圖〉，頁 4a。

²⁶ 乾隆《嵩縣志》卷首，〈城關圖〉，頁 10a；卷一〇，〈城垣〉，頁 1b。

²⁷ 康熙《滋陽縣志》卷一，〈土地部·祠廟〉，頁 47a。

²⁸ 參成一農，〈宋、元以及明前中期城市城牆政策的演變及其原因〉，中村圭爾、辛德勇主編，《中日古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 145-183。

此情況下，一座建於城市邊緣的城隍廟，如何判斷它在城內還是城外？

唐乾元二年 (759)，縉雲縣令李陽冰以禱雨有應，遷建城隍廟，為文以記其事。趙岫《石墨鐫華》以其「自西谷遷廟於山巔」之句，遂以為一經遷移，廟已不在城內。其觀察似有欠周詳。清人王昶《金石萃編》謂：「縉雲縣今隸浙江處州府，縣治四面環山，不立城郭。廟在山巔，與在城中無異。《石墨鐫華》蓋未悉廟之所在也。」²⁹ 這一說法，可以邑志所述佐證。康熙《縉雲縣志》說：「縉憑地險，歷無城池，惟有門樓四座。」按語又云：「縉與松（陽）、遂（昌）各邑俱廬旅而處，不啻一大聚落，所設短垣，關閉而已。往時有議築城者，周度衣帶，南山逼而水易怒，東西北三面高低屈曲不相見。聞舊志云：架九盤之木，城可俯入；決好溪之堰，井盡成簪。如其可城，古人當先為之矣。」³⁰ 城隍廟在縣署西二百步客星山麓，客星諸山為邑城天然屏障，所以說，廟之所在與城中無異。

正如康熙《縉雲縣志》所言，很多地方不太適宜建城，但有一些柵之類的可見物，將城市圍圈起來。比如，廣東陽山城隍廟在縣東學宮之左，洪武間建。陽山舊無城，僅護以木柵，天順七年 (1463) 始築磚城，城隍廟與學宮遂被隔於東門外。³¹ 原先以木柵圍護時，隍廟是否即在柵外？城隍廟與學宮作為地方行政城市的重要建築，似乎一開始應是城市的一部分，祇是未考慮到城牆的選址與走向問題，後來竟然坐於城外。由於文獻有關，此點尚不能確知。

浙江宣平縣也無城，³² 城隍廟為明景泰三年 (1452) 置縣後建，在縣南一百五十步。對於這一方位，萬曆《栝蒼匯紀》稱「在迎恩門外」。迎恩門為四關門之一，在縣南。³³ 道光《宣平縣志》也稱其「在縣西南郭外」。³⁴ 又記：康熙五十五年 (1716) 春，邑令張廷祐為圖捍衛，「乃課民種柳以環之，留四門通出入，俟三年後柳自成圍，此亦思患豫防之意也。今柳亦久殘缺矣」。³⁵ 是否可以認為，雖未建城，但關門及木柵業已清晰地將聚落分隔為內外兩個空間，處於關門、木柵之外的城隍廟，即是一座外廟？

²⁹ 王昶，《金石萃編》卷九一，〈縉雲縣城隍廟記〉（嘉慶經訓堂刊本），頁 26b。

³⁰ 康熙《縉雲縣志》卷一，〈城池〉，總頁 7。

³¹ 順治《陽山縣志》卷三，〈祀典〉，頁 16a；卷一，〈輿地志·城市〉，頁 14b-15a。

³² 成化二十二年 (1486) 刊《處州府志》為宣平縣及所屬處州府現存最早的方志，該志未載宣平有城。後世志書皆然。唯嘉靖《宣平縣志》卷一〈城池〉謂：「開創之初，草創未備，城周圍約計五里，辟四門。」（頁碼不清）所謂城，應指抽象意義上治所所在區域，而非實有城池。

³³ 萬曆《栝蒼匯紀》卷九，〈禮祀紀〉，頁 20a；卷一〇，〈保圍紀〉，頁 6a。

³⁴ 道光《宣平縣志》卷一一，〈禮祀〉，頁 7b。

³⁵ 道光《宣平縣志》卷二，〈建置〉，頁 1b-2a。

陳正祥〈中國的城〉一文指出，漢人對於城郭的形式，有固定的觀念。必須是磚石建的或夯土築的，才算是城；以木柵圍護起來的，不能算作城。並認為方拱乾《寧古塔志》（康熙元年〔1662〕自序）對寧古塔聚落形態的描述，充分流露出此一觀點。志文謂：「無疆界無城郭，枕河而居，樹短柴柵，環三重，關四門而命之曰城；中以碎石甃埤丈餘，關東西門。……柵內即八旗所居。當事者厚待士夫，請旨居士夫於城內；餘人則散居諸屯。」³⁶ 方氏的觀點是否可以代表漢人的普遍認識，不得而知。康熙二十三年（1684）修《盛京通志》記「寧古塔舊城」（康熙五年，寧古塔遷城），則是將石甃空間稱為「石城」；其外層即方氏所指習以為城者，則稱「城外邊牆」。³⁷ 可見，對於木柵牆體可否稱為城，應是見仁見智的。

當然，以木柵圍繞者是否為城，並不影響我們對城內、城外的判斷，顯然，即便是木柵，也已然十分明顯地將城內與城外的區域區分開來。木柵之外，當然是城外之區了。

可是，一座沒有城牆的城市，在建築城牆後，城隍廟成了外廟，那麼，在此之前，城市居民在方位上有沒有內外的感覺呢？或者說城市的邊緣是在何處？尤其使人難以琢磨。而很多城隍廟往往建於這樣一些地方，讓人很難作出判斷。

二· 所用文獻的檢討

考察各地城隍廟，地方志書是最基本的資料。作為地方主要的祠廟之一，城隍廟在方志中總能在特定位置佔有一席之地，包括建置方位、沿革、歷修碑記、軼聞傳說等。就一地方志而言，我們不可能期望通過其中一種即可瞭解當地城隍廟的全部歷史；也不能期望地方志能夠將城隍廟的方位，尤其它與城牆的位置關係記述清楚。不同體例的方志，記述重點不一。重修的方志要比續修的傾向於記述更多的歷史信息，後者則通常側重補充前一次修志後的情況。不過，即便同為重修，對於同一城隍廟的記述，也往往存在諸多不能重合的內容。常見的情形是，或者比較全面的記載城隍廟的歷史，或者過多地關注當下，對其過去則記載疏闊甚至忽略掉了。

³⁶ 陳正祥，〈中國的城〉，氏著，《中國文化地理》（香港：三聯書店，1982），頁 72；方拱乾，《寧古塔志》，〈土地〉，頁 2b-3a。

³⁷ 康熙《盛京通志》卷一〇，〈城池〉，頁 19a。

此外，在不斷的重修、續修中，也有可能出現記述上的誤差。安陸府（嘉靖十年〔1531〕升安陸州為承天府，順治初改稱安陸府）的例子恰能說明此點。萬曆《承天府志》載郡廟：「宋在子城外之高阜，洪武二十年即三王廟基立之。弘治初改遷從岵山東偏。」鍾祥縣康熙間初修邑志，則於其後加「大東門內」四字。上述記載反映了宋以來安陸府城隍廟位置的變動。³⁸ 但至雍正《湖廣通志》卻變成「城隍廟在大東門外」。³⁹ 乾隆六年後所修邑志，則均載為「明宏治初自城外高阜遷從岵山東偏」。⁴⁰ 前者顯係筆誤，後者則是轉錄時將原文作了縮減，導致文意改變。

這一情況表明，考察一地城隍廟，需要將該地所有可以蒐集到的地方志書，盡可能全都查閱，然後才有可能梳理出廟宇的歷史脈絡，尤其是位置上的移動。這是考察外廟最為基礎的工作。

地方志的文字記述，是考察外城隍廟最基本的依據，不過，就記述本身而言，其措辭往往不能準確表明廟址與城牆的關係。在此情況下，地圖顯得尤為重要。在稍微詳細的地圖上，我們會清楚地觀察到城隍廟的位置，城外還是城內，一目了然。前文有關關廂的討論已見一斑。其他方位的例子，也很多見。弘治《黃州府志》載麻城縣城隍廟「在縣南」，〈麻城縣圖〉則顯示，廟在城外西南。⁴¹ 再如，嘉靖元年（1522）《湖廣圖經志書》載宜城縣城隍廟「在縣西一里」，〈宜城縣圖〉顯示，廟在城外西北。⁴² 至嘉靖三十三年（1554）修《宜城縣志》則記為

³⁸ 萬曆《承天府志》卷五，〈典祀〉，頁 7b；康熙《鍾祥縣志》卷三，〈典禮志〉，頁 3b。按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一〇，〈安陸州·祠廟〉，頁 16a：「城隍廟，在大東門內。舊在州西北，洪武初通判祝方創立於三皇廟舊基。洪武中知州陳申重修。弘治中知州趙全以舊廟廢，遷建今所。」三皇廟舊基在陽春臺側（同上，頁 15b, 17a）。據萬曆《承天府志》卷四，〈城郭〉，頁 14b：「府城毀於元末。洪武初年，吳復創築，「東、北並跨山岡」。同書卷一，〈圖經·府屬州縣總圖〉顯示，陽春臺在城內西北（頁 6b-7a）。又據同卷所附反映南宋淳熙年間情形的舊〈鄂州圖〉（關於該圖形成年代，參見魯西奇，《城牆內外：古代漢水流域城市的形態與空間結構》〔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205），城隍廟位於城中（頁 13b-14a）。其西北側為東倉，南宋隆興元年（1163）石才孺〈重修郡治記〉（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一〇，〈安陸州文類〉，頁 2b），稱東倉在子城之東城牆。則南宋時，城隍廟是在子城之外。至洪武中於三皇廟舊址重建。始終在城內。

³⁹ 雍正《湖廣通志》卷二五，〈祀典志〉，頁 46b。

⁴⁰ 乾隆六年（1741）修《鍾祥縣志》卷四，〈祀典〉，頁 26b。乾隆六十年（1795）、同治六年（1867）、民國二十六年（1937）刊鍾祥縣志，均如是。

⁴¹ 弘治《黃州府志》卷四，〈宮室·祠廟〉，頁 29a；卷前，〈麻城縣圖〉，無頁碼。

⁴² 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八，〈襄陽府〉，頁 39a；卷前，〈宜城縣圖〉，無頁碼。

「在縣治西，東至西門，南至路，西至壇，北至寺地」，推算仍在西門外。但實際情況是，廟已在三十年圈入城內，所以，治城圖顯示廟在西門內。⁴³

不過，地圖本身有時也需要辨析。有些地圖中，未建置城牆的衙署，往往標示為一個類似城池的方框形狀，這種情況下，城隍廟通常標示於方框之外，極易被認為是外廟。即如弘治《黃州府志》所載〈廣濟縣圖〉，城隍廟位於一個標有「廣濟縣」方框外的東南方，但這個方框實為縣署，並非廣濟城。廣濟縣城始築於康熙間，因此，弘治《黃州府志》在「城池」一項，沒有廣濟的記載；對於城隍廟則記述為「在縣東北，洪武初知縣陳桂建」。⁴⁴

山西太原縣也是如此。《永樂大典》引《太原志》：「城隍廟在縣治南」。⁴⁵又有〈太原縣圖〉，城隍廟在疑似城垣之外。⁴⁶按：太原縣治本在汾河東，洪武四年（1371）邑令潘原英移河西，位置在晉陽城南關之地。晉陽城毀於宋，至明初似未有城。考《永樂大典》所收太原府屬州縣圖，縣治之地所繪方框均為內外兩圈，其外圈，除〈太原縣圖〉與〈寧鄉縣圖〉皆為單線外，其他均為複線。⁴⁷經查，後者在洪武年間均建有城池，而寧鄉則無。⁴⁸可證太原縣在明初應未建城。但後修志書的表述有異。除嘉靖《太原縣志》明確記載為景泰元年（1450）知縣劉敏「因舊基始築城」外，⁴⁹均載知縣劉敏「因舊基築」，於潘原英本傳又有「改築城池」之語。⁵⁰這種差異，很可能是因為，〈太原縣圖〉中包含縣衙、文廟、養老院在內的方框，或是對實有之物的摹寫，但此物是否可以稱之為城，認識卻不一致。⁵¹

⁴³ 嘉靖《宜城縣志》卷中，〈祠廟〉，頁38a；卷前，〈縣城圖（圖名闕）〉，無頁碼。

⁴⁴ 弘治《黃州府志》卷四，〈宮室·祠廟〉，頁33a；卷一，〈地理·城池〉，頁18b-19b。

⁴⁵ 馬蓉等點校，《永樂大典方志輯佚》，頁218。《太原志》作者不詳，洪武十二年（1379）至十三年間修，詳李裕民，〈洪武《太原志》研究〉，《城市改革理論研究》1985.1：66-72。

⁴⁶ 馬蓉等，《永樂大典方志輯佚》，頁3259。按：黃燕生〈《永樂大典》地圖考錄〉一文，指圖中空白方框為太原縣城池，有誤。文載《文獻》1988.4：154。

⁴⁷ 馬蓉等，《永樂大典方志輯佚》，頁3258-3284。

⁴⁸ 成化《山西通志》卷三，〈城池〉，頁1a-4b；康熙《寧鄉縣志》卷二，〈城池〉，頁4a。

⁴⁹ 嘉靖《太原縣志》卷一，〈城池〉，頁5a；〈名宦〉，頁26b-27a。

⁵⁰ 引文出成化《山西通志》卷三，〈城池〉，頁1b；卷八，〈名宦〉，頁66a。該志記太原縣城，「即晉陽城南基，國朝景泰元年知縣劉敏因舊基築」。雖未言始築，亦未言前此有城。

⁵¹ 《永樂大典》殘卷還有很多地圖，由於與地圖相關的文字記載多未存留下來，考察其繪製時代及標示物性質，顯得異常困難，〈太原縣圖〉已見一斑。因此，本文不擬對《永樂大典》所引地圖中的疑似外廟逐一考辨。

利用地方志考察外廟，還應注意到上位志書在記述上可能存在的問題。中國的地方志，存在於各種層級。上位志書的修纂，主要依據前志（假定已修），參以下位志書。形式上也會委令下位政區官員負責採訪、輯錄本區資料。因此，下位志書在編纂的連續性得不到保證，以及不能完整保存的情況下，上位志書總能給以或多或少的補充。但上位志書的記述往往給我們的判斷帶來麻煩：有些內容與下位志書的記述不符。上位志書修纂時，需要參考下位志書，後者若非新修，很有可能不會反映當下的情形，如果修志者不瞭解城隍廟的變動，未做實地訪查，則記於新修上位志書中的，有可能仍然是若干年以前的情形。亦即，如果一座城隍廟已由城外遷入城中，但新修方志記載的，仍然是一座城外的城隍廟。表現出「遲滯性」的特徵。略舉兩例：

廣東陵水縣城隍廟舊在城北，萬曆十年（1582）遷入城中。正德《瓊臺志》、嘉靖《廣東通志》均載「城隍廟在城北」。至雍正《廣東通志》仍記為「在城北」。⁵²顯然是襲用了舊修通志所載。萬曆四十五年（1617）刊《瓊州府志》，雖記城隍廟在「城內」，但陵水縣境圖卻仍將其繪於城北儒學旁。⁵³

湖南新寧縣城隍廟，景泰二年（1451）因築城坐南門外，正德十一年（1516）遷城內縣治東。（詳附表）嘉靖《湖廣圖經志書》所載〈新寧縣圖〉，卻顯示廟在南門外。⁵⁴據吳廷舉序，該志但取成化二十年（1484）所修志書以後事續入。⁵⁵而新寧縣至萬曆間始創修邑志。⁵⁶是知嘉靖《湖廣圖經志書》所錄〈新寧縣圖〉極有可能沿自成化舊志而未改。

概括言之，如果上位志書所載與下位志書相左，不應想當然地認為前者有誤。上位志書的記載，通常祇是表明，在過去的某一時間而未必是志書修成之時，城隍廟確是位於這一位置。

當然，上位志書引述下位志書的過程中，出現筆誤也是常有的，應作具體分析。有些是屬於明顯的記載錯誤。比如雍正《河南通志》載長葛縣城隍廟「在東

⁵² 正德《瓊臺志》卷二六，〈壇廟〉，頁 27b；嘉靖《廣東通志》卷三〇，〈政事志〉，總頁 755；雍正《廣東通志》卷五四，〈壇祠志〉，頁 63a。

⁵³ 萬曆《瓊州府志》卷一，〈輿圖志〉，頁 14b；卷四，〈建置志〉，頁 56a。

⁵⁴ 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一六前，〈新寧縣圖〉，無頁碼。

⁵⁵ 嘉靖《湖廣圖經志書》的編纂過程，李秋芳〈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及其史料價值〉（《史學史研究》2010.4：112-117）一文已有梳理。

⁵⁶ 車大任，〈新寧縣志敘〉，萬曆《新寧縣志》，頁 1b-2a。

門外」，⁵⁷ 但其他記載該廟的志書，都無此記載。尤其是，其前的康熙三十年（1691）修《長葛縣志》和其後的乾隆《長葛縣志》，均載為「在縣治東北」，並在圖中明確標示位置在城內東北。⁵⁸ 此外，雍正《山東通志》所記臨朐東城隍廟，雍正《廣東通志》記英德縣廟，均屬此類。⁵⁹

是否存在一種可能：本位於城內的城隍廟，在短暫的遷出後，又遷回原址，而就在遷出之時，正值上位志書編纂，通過當地參與編寫者或採訪者記載下來，後修志書則或求簡潔而將這段歷史略去，先前的上位志書，就成了所有記載該廟的志書中唯一記載其外廟歷史的了。這種可能性在理論上應是存在的，如若存在這樣的情形，而且不是簡單地記為「在城外」，應是可以採信的。不過，這樣的事例，筆者尚未見到。

上下位志書記載不符，還有一種很少見的情況，即下位志書參考早期上位志書時，由於某種原因，記述上出現了偏差。弘治《八閩通志》記閩清城隍廟：「在縣西門內。舊在縣治之西，洪武元年建，永樂十年知縣宋殷修。天順六年災，知縣左輔移建今所。」⁶⁰ 但今存閩清縣的兩種舊志，都載為「舊在縣西門內，明天順六年移建西門外」。⁶¹ 難道是弘治省志將「西門外」誤為「西門內」？實則不然。閩清舊未建城，東西北面創三敵樓，置柵為門。⁶² 至順治十七年（1660）始造城垣，設東南西北四門。因而弘治省志於「城池」一項不載閩清。所以，可能的情形是，彼西門非此西門：弘治時的西門在城隍廟之西，順治以後的西門則在廟之東。但閩清邑志分別以兩個時期不同的城門位置為座標，描述同一座城隍廟的方位，當然就會說「舊在縣西門內」（意即曾在舊西門之內）、「明天順六年移建西門外」（即是說，其位置在今西門外）。這就與弘治省志的記載產生了矛盾。

⁵⁷ 雍正《河南通志》卷四八，〈祠祀〉，頁 87a。

⁵⁸ 康熙《長葛縣志》卷二，〈祠宇〉，頁 15a；同書卷前，〈圖考·長葛縣城之圖〉，頁 2b-3a；乾隆《長葛縣志》卷二，〈建置〉，頁 26b；同書卷前，〈縣城圖〉，無頁碼。

⁵⁹ 分見雍正《山東通志》卷二一，〈秩祀志〉，頁 30b；雍正《廣東通志》卷五四，〈壇祠志〉，頁 18b。

⁶⁰ 弘治《八閩通志》卷五八，〈祠廟〉，頁 28a。

⁶¹ 閩清縣舊志今存乾隆、民國兩種。引文出自乾隆《新輯閩清縣志》卷一，〈壇廟〉，頁 19b。

⁶² 正德《福州府志》與萬曆四十一年（1613）刊《福州府志》均未載及。見正德《福州府志》卷四，〈地理志〉，頁 70-71；萬曆《福州府志》卷五，〈輿地志·城池〉，頁 9b。

鑒於上位志書記載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如果缺少佐證，僅以上位志書的記載，我們不能貿然採信，祇作存疑。⁶³

相對於複雜的城隍廟建置，地方志的記述往往不能提供足夠的信息，幫助我們確定城隍廟址與城牆的確切關係。即如，大庾為南安府附郭，城隍廟建於萬曆年間。先在「興教寺左」王陽明祠故址，康熙七年（1668），官民改建管界都玉池坊府城隍廟左。⁶⁴ 改建之地在水南城內，興教寺則在水南城外西。則所謂「興教寺左」是在城牆之內，還是城牆之外？單從文字敘述，很難確定。

又，康熙《寧化縣志》：「（城隍）廟舊在邑治南，洪武二年知縣蔣原義遷於城內東隅一里許。」⁶⁵ 給人的感覺是，洪武二年（1369）遷址前，廟在南城外。據開慶《臨汀志》，寧化城隍廟在「縣南一里」。而在當時，縣城基址周五百丈，縣署在城中具體方位不詳。⁶⁶ 即便城池南北長度為東西的二倍，且縣署位於城北隅，距其南一里之處，極有可能是在城外。況且，所謂「縣南一里」，有可能是以南城而非縣署為起點，也未可知！不過，這祇是推理，因文獻所缺，不能證實。

因而，對於涉及具體地理位置的考察，應該像其他歷史地理問題一樣，需要必要的實地考察。當然，對於年代稍早的事象，實地的考察，可能會比較困難。

總而言之，利用方志考察城隍廟與城牆各自的位置變動，以及由此導致的前者相對於後者所表現出的所謂「內」與「外」的關係，是一個非常複雜，因而研究難度較大的課題。不僅要求對方志做全面的爬梳，而且各部方志之間的關係即資料的來源要先釐清，尤其對於上位志書可能出現的遲滯性與記載的錯誤，需要保持一定的警醒。⁶⁷ 但是，方志本身的記載有其侷限，單靠方志，不能滿足研究需求，實地考察大有必要。

⁶³ 這樣的例子很多，即如嘉靖二十一年（1542）刊《陝西通志》卷八，〈土地五·建置沿革〉，頁 5b，汧陽縣圖標示城隍廟在城外北，由於嘉靖二十六年汧陽以水患遷城，邑志也對舊城城隍廟一無所載，對於省志的說法，祇能存疑。又如，康熙《京山縣志》卷前，〈京山縣志圖〉，頁 1b-2a 所錄〈宋淳熙富水郡志京山縣圖〉顯示，京山有二座城隍廟，一在城西門外。淳熙《富水志》已佚，西門外之廟難以詳考。其他還有《殿粵要纂》卷四，〈田州圖〉，總頁 882 所示郭城外東北之「外城隍」等等。

⁶⁴ 康熙四十九年（1710）刊《南安府志》卷一二，〈祠祀志〉，頁 7a。

⁶⁵ 康熙《寧化縣志》卷七，〈政事部下·壇壝廟祠志〉，頁 6a。

⁶⁶ 馬蓉等，《永樂大典方志輯佚》，頁 1279, 1210, 3315。

⁶⁷ 魯西奇教授考察明清漢水流域地方城市之形態與空間結構，對主要資料——地方志——所作的檢討，與本文有類似的旨趣，參見氏著，《城牆內外》，頁 439。

三·外廟概觀

根據地方志書的相關記載，筆者對部分區域的城隍廟作了審慎的考察。由於本文所用統計資料（數據）多出自清代，故而，所涉區域擬依《清史稿·地理志》。如此，則主要包括直隸、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浙江、福建（含臺灣；臺灣至光緒間始建省，故不單獨列出）、江西、湖南、湖北、廣東、廣西等地。如有必要，在具體討論中，也會適當使用上述地區之外的資料。⁶⁸

從整體上看，外廟分佈於不同層級，從府州到廳縣，再到軍事城鎮以及村鎮聚落，都有外廟存在。⁶⁹ 但將所有不同層級的外廟放在一起探討，顯然不合適。相較於府州縣治城隍廟，各地以方志為中心的地方文獻是否記載村鎮城隍廟，帶有一定偶然性，在已經確認的建於城牆外的村鎮城隍廟之外，肯定還有很多。因此，在不能得到相對完整的統計之前（事實上這樣做幾乎不可能），不宜將村鎮城隍廟計算在內。下文的統計，主要圍繞府州廳縣治外城隍廟展開。

根據考證，能夠確認建於城外的府州縣城隍廟約有 107 座。從時間上看，至少在北宋時代就已存在，直到民國時期，仍有新的外廟出現。宋金元時期，約有 11 座。其中 7 座一直延續到明代。這一時期的外廟，除了陝西、山東的 3 座外，主要集中在浙江（4 座）、江西（3 座）。（見表一）明清時期外廟數量並不次於上述地區的兩湖、兩廣等地，則僅有 1 座。存在於宋元時代的外廟，如果缺少適當的媒介，很難讓七、八百年後的人們所知，陝西的雲陽、澄城，以及山東的臨朐，主要通過碑記文，浙江、江西則多依靠方志的記載。相對於今日我們見到的大量明清方志，早期的宋元方志留存很少，地域分佈上也主要集中在江浙地區。⁷⁰

⁶⁸ 從大量的方志文獻中確定並考察一座外廟，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對所有區域的外廟進行考察，是一項超出筆者能力的工作。本文所考察的區域，已涵蓋了清代內地十八省的主要部分。東北、蒙古、新疆、西藏等邊遠地區，由於實行較內地不同的管理體制，且就現存方志來看，較難梳理各該地城隍廟的歷史。因此，未在考察之列。

⁶⁹ 在本文所涉及的區域中，州縣以下聚落的外城隍廟，可以確認的主要有：明代福建永寧衛中左千戶所，清代廣東陸平縣碣石城、西寧縣封門所，清代廣西永安州杜莫寨，清代山東威海衛百尺崖所，清代陝西平利縣鎮坪、鄆縣趙王鎮等。出處從略。

⁷⁰ 相關研究，參鄭利峰，〈宋代地方志南北修撰異同論〉，《史學史研究》2009.2：101-110；顧宏義，《宋朝方志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前言〉，頁4；顧宏義，《金元方志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前言〉，頁2-3。

表一：宋金元時期部分地區外城隍廟統計

	山東	陝西	浙江	江西	湖南	合計
北宋			1	1		2
金		1				1
南宋			4	2		6
元	1	1	3	3	1	9
總計	1	2	4	3	1	11

說明：總計一行中的數字，表示所在地區不同時期曾經存在的廟數之和。

與此相關，各地現存明以來舊志，修於明代的數量較少，且主要修於明中葉之後，⁷¹ 雖然這些方志毫無例外會對此前的歷史有所記述，但由於其記述的詳略以及所依據資料（比如舊志）的多寡不一，對於很多在明前期已存在的外廟，我們不能確定在哪一時間，成為了那樣的狀態。表中顯示各地洪武中有很多外廟，實則有一半左右，應在此前已經出現。方志的缺失，也導致存在於明代天順至萬曆間的外廟，有十餘座不能確定其初始時間。

判斷外廟的存續時限，需要方志連續的記載，就方志的編修時代看，一九四九年前的民國時期產生了數量眾多的方志，無疑是一個重要階段。不過，就外廟所在地方而言，咸同以後很多再無志書行世（也可能因方志書目失收而不為筆者所知），⁷² 而近年新修志書對此又大多語焉不詳。雖然有些可以通過流傳的外廟傳說，證實外廟可能延至民國，但仍有十數座不能確定是否持續到更近的時間。這就提示我們，有關外廟的研究，主要應就明中葉至清中後期之間的情形展開。

⁷¹ 據統計，現存明代方志1014部（包括少量鄉鎮志、衛所志、關志），其中，修於成化以前者，僅存27部。參巴兆祥，〈論明代方志的數量與修志制度——兼答張昇《明代地方志質疑》〉，《中國地方志》2004.4：48-49。

⁷² 參許衛平，《中國近代方志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頁102-105，對一九四九年前民國時期方志編修成果的討論，有關方志數量統計中的不完整性問題，也有說明。

表二：明清時期部分地區外城隍廟統計

	直隸	山西	山東	河南	陝西	浙江	江西	湖北	湖南	福建	廣東	廣西	合計
洪武	(1) 1	(1) 1	4	3	1	(1) 2	7	1	(2) 4	2	1	(2) 10	(7) 37
建文	1	1	4	3	1	1	7	1	4	2	1	7	33
永樂	1	1	4	3	1	2	7	1	4	2	1	7	34
宣德	1	1	4	3	1	2	7	1	4	2	1	7	34
正統	1	1	4	3	1	2	7	1	5	2	1	7	35
景泰	2		4	(1) 4	1	2	7	1	6	2	1	8	(1) 38
天順	1		4	3	1	2	7	1	7	2	(1) 3	(1) 9	(2) 40
成化	1		5	3	1	2	7	(1) 4	7	2	4	9	(1) 45
弘治	1		5	2	1	2	10	4	(1) 7	4	4	8	(1) 48
正德	1		5	2	1	4	(1) 13	4	6	4	(1) 4	(1) 9	(3) 53
嘉靖	1		5	(1) 3	2	(1) 6	13	(1) 5	(1) 7	3	8	(1) 8	(5) 61
隆慶	1		5	2	2	6	10	3	7	2	6	7	51
萬曆	1	(1) 1	(1) 6	2	2	6	11	4	8	2	6	(1) 9	(3) 58
天啟	1	1	5	2	2	5	11	3	8	2	5	9	54
崇禎	1	1	5	3	2	5	11	3	8	2	5	9	55
順治	1	1	5	(1) 4	3	5	11	4	8	3	5	9	(1) 59
康熙	(1) 2	(1) 2	5	4	3	5	11	4	10	4	5	10 (1)	(2) 65 (1)
雍正	2	3	5	3	(1) 4	5	9	3	10	4	4	9	(1) 61
乾隆	2	3	5	3	4	5	9	2	(1) 11	4 (1)	4	8	(1) 60 (1)
嘉慶	2	3	6	3	5	5 (1)	8	2	11 (1)	2	4	6	57 (2)
道光	2	3	6	3	6	4	8	1	9	2	3	6 (2)	53 (2)

	直隸	山西	山東	河南	陝西	浙江	江西	湖北	湖南	福建	廣東	廣西	合計
咸豐	2	3	5	3	6	4	8	1	9	2	3	4	50
同治	2	3	(1) 6	3	6	4	8 (6)	1	9 (1)	2	3 (1)	4	(1) 51 (8)
光緒	2	3	5	3	6	4 (1)	2	1	8 (4)	2	2	4 (1)	42 (6)
宣統	2	3	5	3	6	3	2	1	4 (1)	2	2	3	36 (1)
總計	3	4	8	7	6	6	14	7	14	6	9	18	102

說明：(1) 表中加括弧的數字，表示同格另一數字中起始或終止年不詳者。置於前，表示存在於這一時期之前，起始年不詳；置於其後，表示存在於這一時期之後，終止年不詳。

(2) 總計一行中的數字，表示所在地區不同時期曾經存在的廟數之和。

據此，如表二所示，整個明清時期，在所統計的區域中，外廟始終保持在五十座左右。但從中並不容易看出歷史時期外廟的整體性變化。

從地域分佈看，南方地區廣西、湖南、江西諸省均超過十座，北方的直隸（3座）、山西（4座），中部的湖北（7座），南方的福建（6座）則較少。但這樣的比較是有問題的，因為沒有考慮到時間的因素。有些外廟如直隸良鄉、江西崇義等地僅存在四、五年，而江西吉安府、山東臨朐、湖南郴州等處，則存在了數百年之久。如作地域比較，以同一時段存在的外廟數為對象或許更好。此外，單純的數字，也許無法確切地說明問題。以不同地區外廟所佔各該地總數的比例進行比較，更為適當。

表三是對清代雍正間各地外廟及城隍廟總數的統計。清前期差不多是各地外廟最多的時期之一，而且，各省均在這一時期編修了通志，為我們的統計提供了便利。需要說明，一地城隍廟並非省志所必須記述的，對於相關記載缺失的省份，本文採用其行政治所數目，並適當考慮到附郭城隍廟的情況。如果附郭縣單獨立廟，也在統計之列。⁷³ 此外，由於舊廟的存在，使得對應於一處行政治所的城隍廟或存在一座以上，由於舊廟與「新廟」的關係較為複雜，不易統計，故從略。

⁷³ 洪武三年詔令天下府州縣，都依式建廟。起初，附郭縣多不單獨立廟。明中葉以來，出現獨立設廟的情況。參前揭張傳勇，〈附郭城隍廟考〉。

表三：清雍正時期外廟所佔比例統計

	直隸	山西	山東	河南	陝西	浙江	江西	湖北	湖南	福建	廣東	廣西	總計
外廟數	2	3	5	3	4	5	9	3	10	4	4	9	61
總廟數	148	108	109	116	85	83	85	66	76	72	90	84	1122
比例(%)	1.35	2.78	4.59	2.59	4.71	6.02	10.59	4.55	13.16	5.56	4.44	10.71	5.44

說明：所用通志資料為：雍正《畿輔通志》〈建置沿革〉、〈祠祀〉，雍正《山西通志》〈沿革〉、〈祠廟〉，雍正《山東通志》〈建置〉、〈祠祀〉，雍正《河南通志》〈沿革〉、〈祠祀〉，雍正《陝西通志》〈建置〉、〈祠祀〉，雍正《浙江通志》〈祠祀〉，雍正《江西通志》〈祠廟〉，雍正《湖廣通志》〈沿革〉、〈祠廟〉，雍正《廣東通志》〈壇祠〉，雍正《廣西通志》〈壇廟〉。以上均為《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數、頁碼不再注出。

上表顯示，在雍正時期，外城隍廟佔到所統計區域總廟數的 5.44%，即是說，每二十座城隍廟中，就可能有一座處於城外。整體上看，南方地區要比北方地區的比例要高，密度最大的廣西、湖南與江西，都在南方地區。呈現出明顯的地域差異。

作為一種與城市關係密切的祭祀建築，城隍廟在城市中的建置方位，已受到歷史地理研究者的關注。研究者對黃土高原城鎮中城隍廟方位所作統計表明，城隍廟傾向於建在西方，與其作為陰間衙署的性質有關。⁷⁴ 根據筆者的觀察，人們對城隍廟的建置方位通常會有一套說辭，表明所在位置的正確，給我們的印象是，城隍廟的位置不是隨意為之的。那麼，對於建在城外的城隍廟而言，在方位上有沒有一定傾向呢？根據統計，除永綏、上思各有一次位置不詳外，處於城外的城隍廟共有 112 處（次）。在八個方位中，最多的是南方，佔 24.11%，其次是東方，佔 18.75%。但這樣的統計很可能說明不了什麼，因為，從後文可以看到，城隍廟建在城外，情況千差萬別，多半不是人們主觀意願使然。⁷⁵ 而且，方志文獻對於廟址的記述與相關地圖的標示，也不見得準確。

不過，不管城隍廟的方位如何，單就其位置而論，往往是重要的居民聚集區。與之毗鄰的還有其他的重要城市建築。比如，青縣城隍廟在東關，至清代初年，同一區域還有察院、學宮等衙署，以及馬神廟、帝君廟等祭祀建築。⁷⁶ 民國

⁷⁴ 前揭劉景純，〈清代黃土高原地區城鎮宗教祭祀景觀的分佈特徵〉。

⁷⁵ 其實，城內城隍廟的建置方位，由於受制於城市空間佈局，同樣未必充分表現人們的主觀意願，這一問題，可作進一步探討。

⁷⁶ 康熙《青縣志》卷一，〈城池〉，頁 7a-8a；卷首，〈圖〉，頁 3a。

《青縣志·青縣關廂街市圖》說明文字為：「按縣城南西北三面均無居民，所有城外街市盡在東關。」⁷⁷ 作為傳統城市形態的重要構成部分，如果將城隍廟建於城外，通常情況下，至少不應選在遠離人群之地，這應在情理之中。反過來，城隍廟的建置，同與之相鄰的其他城市建築一起，也會促進臨近街區的發展。臺灣鳳山縣建治於興隆莊，康熙六十一年（1722）築土城，城隍廟與學宮被隔於北門外。後來，這一區域成為鳳山城北部重要的街區。⁷⁸ 這樣的情形，在各該地方志縣境圖上，有更為直觀的展示。

有研究表明，中國傳統的城市空間不應限於城牆之內，城牆之外街區的發展，是城市空間拓展的重要表現。⁷⁹ 外城隍廟及其所在空間，正證明了此點。

四·城外何為？

城隍廟為何在城外？考察這一問題，實際是考察城牆與城隍廟址的位置關係。通常情況下，兩者任何一方位置的移動，都有導致城隍廟處於城牆之外的可能情形出現。我們首先考察，在城隍廟位置相對不變的情況下，由城牆變動導致城隍廟隔於城外的情形。

首先，城址的近距離位移，將本在舊城內的城隍廟，隔於新城之外。南唐元宗十八年（960）置龍泉縣，設治遂水之南，城周三里。宋明道二年（1033），縣治徙建水北，繚以土垣，歷修不廢。邑廟創於宋天聖八年（1030），其址相沿未改，直至清末。⁸⁰ 廟址起初當在水南城內，迨南城漸廢，遂為外廟。⁸¹ 又如膠州城隍廟，洪武二年（1369）重建於西關外。按：乾隆《膠州志》記膠西縣故城，「在今治西北里許，俗名為土城口，順帝至正十七年毛貴陷膠州，城廢，後移治今所，乃元置兵馬分司城也」。⁸² 據此推測，城隍廟所在之處，應為元膠州城裏，

⁷⁷ 民國《青縣志》卷前，無頁碼。

⁷⁸ 康熙《鳳山縣志》卷三，〈祀典志〉，頁45；乾隆《重修鳳山縣志》卷二，〈規制志·城池〉，頁29。相關探討參見林佩諭，〈鳳山縣舊城及周遭聚落變遷之研究（1661-1970）〉（臺南：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02），頁32。

⁷⁹ 相關研究，參魯西奇，《城牆內外》，頁274-354。

⁸⁰ 乾隆《龍泉縣志》卷一，〈城池考〉，頁16b-17b；同書卷九，〈建置志〉，頁2a；同治《龍泉縣志》卷三，〈建置〉，頁5b。

⁸¹ 水南城遷治之後的情形，後修志書未載及，其隳廢時間不詳。

⁸² 乾隆《膠州志》卷一，〈沿革〉，頁36b-37a。

或即元膠州城隍廟舊址。⁸³ 再如，濬縣城隍廟在浮邱山上，洪武初建（或為重建）。有洪武初敕封濬州城隍詔碑。濬州城先在浮邱山上，洪武初改縣後，徙東北平陂。廟遂坐南門外。⁸⁴

其次，城牆的收縮。出於軍事防禦、城池維護等方面的考慮，將原來較為闊大的城池截去一塊，如果城隍廟恰在被截去的區域，那麼，廟就坐於城外了。即如撫州府首縣臨川，城隍廟建於宋天聖五年（1027），據康熙《撫州府志》卷首所錄〈景定州舊治圖〉，位置在郡城西南隅。⁸⁵ 明初改建城池，削去西南城，城隍廟、文廟俱坐順化門外。⁸⁶ 嶧縣（洪武二年，嶧州降為縣）城隍廟在嶧州治前，元初刺史孔瑄建。嶧州舊城，周十里，洪武初年，城改築西南隅，城隍廟遂坐郊關間。康熙《嶧縣志》卷前載圖顯示，廟在縣城與舊嶧州城牆垣之間。⁸⁷ 奉新縣城隍廟，據康熙《奉新縣志》：「在縣治北城之外。本縣舊係土城，萬曆九年創修磚城，遂將迤北城垣移狹三百餘步，廟乃居城外。」⁸⁸

再次，自然災害尤其是水災，導致城牆基址發生移動。南安府城隍廟在水南城管界都玉池坊，宋已建。府城始築於宋淳化間，萬曆郡志稱宋城「西南隅即今城隍廟背，郡人猶稱土城背」。則廟址似本在城內。元時大水，穿城而過。隍廟坐河南。至正十二年（1352）於河北築城，始成外廟。⁸⁹ 故洪武初年廟記稱城隍廟「距城三里許」，嘉靖四年（1525）刊《江西通志》則謂「在府城南門外二里管界都玉池坊，即宋元舊基也」。⁹⁰

城牆在時間上建於城隍廟之後，也會出現城隍廟未被圈入城內的情形。恩縣

⁸³ 道光《重修膠州志》卷一三，〈建置志〉，頁14b載城隍廟，「始建不詳，明洪武二年重建，未備其制，八年知州趙禮增建」。又同書卷二二，〈列傳·張恭〉，頁1a：「洪武初為知州，二年建城隍廟。」注明「據成化十五年修城隍廟碑」。該碑節文收於同書卷三九，〈金石考〉，頁13a，謂「膠州舊有城隍祠，在城外西隅，國朝洪武二年知州張恭所建」。至於在闕文中是否提及重建，不得而知。

⁸⁴ 嘉慶《濬縣志》卷六，〈建置志〉，頁48b, 1a-b。

⁸⁵ 康熙《撫州府志》卷首，〈疆域圖〉，頁2a。

⁸⁶ 同治《臨川縣志》卷一四，〈建置志〉，頁18a；卷一五，〈建置志〉，錄康熙十八年（1679）陳洪諫〈臨川縣改遷城隍廟碑記〉，頁11b。

⁸⁷ 康熙《嶧縣志》卷二，〈祠祀志〉，總頁441；卷一，〈地里志〉，總頁401-402；卷前，〈嶧縣城圖〉，總頁345。

⁸⁸ 康熙《奉新縣志》卷五，〈祠祀志〉，頁3a。

⁸⁹ 萬曆《重修南安府志》卷一〇，〈建置志〉，頁1b。

⁹⁰ 嘉靖《南安府志》卷一一，〈秩祀志〉，錄洪武初年伍庠廟記，頁19a；嘉靖《江西通志》卷三六，〈南安府·祠廟〉，頁47b。

治於洪武七年遷址，遂即創建城隍廟，至成化三年（1467）建城，廟坐北門外。⁹¹再如慶元縣城隍廟，洪武十四年（1381）建，在縣治東儒學右。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始築城，廟遂坐豐山門外。⁹²

傳統觀念中，治所是應該建城的，但近來的研究指出，城牆之於治所，並非必要條件。宋以來，在若干歷史時期，實行整體或局部的不築城政策，任城牆傾圮乃至加意隳廢。宋代（主要在內地）及元代前中期，都是不修城的時期。明代洪武年間，各地有築城者，但並不普遍。明中葉成化年間以來，由於地方不靖等因素，各地開始普遍建起城牆。即以湖廣地區為例，成化時，鄖陽地區出現農民起義，一度蔓延到荊襄地區，這些地區紛紛建起城牆。再如福建地區，明中期鄧茂七之亂後，原來無城之區，尤其被戰事波及的州縣，紛紛築起城郭；明代後期，在寇盜侵擾下，又有很多地方建起城池。⁹³有些地方，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因為城牆的修築，出現了外廟。比如浙江開化縣，正德間以寇亂築城，廟遂隔城外。（見注 111）但這樣具有直接因果關係的例子，似乎並不多。所以，外廟歷史時段上的變化與築城史並不甚合拍。

我們注意到，外廟所在的治城，在一次大規模的築城之前，往往具有如下形態：(1) 前次築城後，雖不再受重視，任由隳圮，但殘垣尚在，仍可見城治範圍；(2) 土牆，似不能與城池相比，但仍有區隔城市內外的功能；(3) 無城，但樹立木柵，設立城門，雖無城之實，卻有界定城內範圍的作用。所以，從總體上，外廟的出現同築城有密切的關係，但各地築城的歷史及城治形態各異，使得因築城而出現的外廟，在時間上並沒有多少規律可以把握。不過，一些本來處於城外的城隍廟，由於城牆的新築或重築，從而結束了作為外廟的狀況，如果從這一角度考慮，外廟與築城史的聯繫可能更多一些。

從另一方面說，在城牆基址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城隍廟址發生改變，也可能出現坐於城外的情形。這樣的情況也很多見，比如青州之例。青州府城有兩座城隍廟，其一位於西門外陽（洋）水北岸，光緒《益都縣圖志》說，廟舊在城西北隅龍興寺東，「明洪武初拓地建齊藩，知府張思問移廟於西門外陽水北岸。天順

⁹¹ 嘉靖《恩縣志》卷四，〈政教志〉，總頁 150；卷二，〈都鄙志〉，總頁 114。

⁹² 康熙《慶元縣志》卷二，〈建置志〉，頁 10a；卷一，〈輿地志〉，頁 3a。

⁹³ 參成一農，〈宋、元以及明代前中期城市城牆政策的演變及其原因〉；魯西奇、馬劍，〈城牆內的城市？——中國古代治所城市形態的再認識〉，《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9.2：7-16。明代福建地區的情況，尤其參見徐泓，〈明代福建的築城運動〉，《暨大學報》3.3 (1999)：25-76。

元年知府徐郁復移於城內西南隅齊世子廢府」。其後相沿不改。「其在陽水上者，俗曰外廟」。⁹⁴ 外廟所處位置，據光緒《益都縣圖志》縣城北關圖，正位於青州府城北東陽城故址西南隅。⁹⁵ 府廟為何要移至這一地點？嘉靖《山東通志》說，洪武間因建齊藩，即東陽城故址修築土城，尋以齊藩國除而止。⁹⁶ 由此可以推知，明初之建齊藩府第、移廟西門外與修復東陽故城是一統一規劃，本意在城隍廟址建齊藩府第，而將廟移至即將修復的位於陽水北岸的東陽城內，然東陽城的修復半途而廢，但廟已遷到陽水北岸，遂使城隍廟變成無城牆圍護的外廟。

傳統信仰觀念中，城隍神與城牆（尤其是治所城牆）具有特殊關係，理當建於城內，但是，為什麼在修城時，不把城隍廟圈入城內，甚至出現將城隍廟徙於城外或直接建於城外的情形？

這其中的原因較多，甚至各不相同。最有說服力的，是因為城池太小，在主要衙署之外，已不能容納更多建築。比如廣西博白縣城隍廟，始建未詳，明初已有，在東城外。⁹⁷ 博白縣城，唐武德中始創土城，元至正中砌磚，周二百二十丈，洪武六年（1373）復修。⁹⁸ 萬曆四年（1576），擴城西南一百八十丈。陳良珍〈重修博白縣城記〉形容擴城前情形：「其形如甕，卑且隘，僅容廩廩，巨室富民鮮居其中。」⁹⁹

湖南桂陽縣，城隍廟始建未詳，嘉靖《湖廣圖經志書》載「在縣南城外半里許」。¹⁰⁰ 按桂陽縣於宋太平興國三年（978）遷治，嘉定丙子（1216）始築城，乾隆邑志記為：「周圍一百六十步，高二丈，南北有門，其後因隘，獨開南門。今

⁹⁴ 光緒《益都縣圖志》卷一三，〈營建志上〉，頁 7b-8a。

⁹⁵ 光緒《益都縣圖志》卷三圖三，〈城外坊巷〉，頁 3a。康熙六十年（1721）刊《青州府志》卷一〈輿圖〉頁 3，也清楚地標明城隍廟在舊城以內。但其他志書，如嘉靖《青州府志》卷一〈益都縣境圖〉及〈青州府治圖〉，由於繪製極為簡略，如果將靠近外廟的一條表示東陽城舊址的線段向陽水（圖中作「洋水」）作自然延伸，外廟將會處於線條外側。頁 3a, 4a。

⁹⁶ 嘉靖《山東通志》卷一二，〈城池〉，頁 20b-21a；卷二二，〈古跡〉，頁 26a。宿白〈青州城考略〉一文對此也有考察，載《文物》1999.8：51-53。

⁹⁷ 馬蓉等，《永樂大典方志輯佚》，頁 3367 錄〈博白縣境圖〉。

⁹⁸ 崇禎《梧州府志》卷五，〈建置志〉，無頁碼。按：《永樂大典方志輯佚》頁 3047 錄《鬱林志·城池》：博白縣原有城池，周二里八十步，「今復如舊也」。據張國淦，《永樂大典方志輯本》，頁 1531 考訂，《鬱林志》係元據宋志增補，明又據元志補。

⁹⁹ 崇禎《梧州府志》卷一七，〈藝文〉，無頁碼。

¹⁰⁰ 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一四，〈郴州·祠廟〉，頁 26b。

之縣治以東、分司以西，即舊址也。城中僅容二衙門而已。儒學、民居皆環於外。」¹⁰¹

廣東乳源縣，洪武元年（1368）遷治於洲頭津，築土為城，周一里有奇。洪武六年建城隍廟於東門外。萬曆年間知縣黃華秀云：「余觀乳城周不能里，文廟、隍社並在城外，偏小殊不稱縣治。」¹⁰²

這樣的情況主要出現於長江以南地區。根據研究，明清時期地方府州縣治城規模，南方廣西、廣東、湖南、江西等地，遠低於全國普遍水平。李孝聰依據《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及《續編》所收方志，考察明代府州縣城規模，發現不同地區同等級別城市之間的規模存在明顯差異。雲南、貴州、四川、廣東四省府治城市的平均規模遠低於全國的平均值，四省及廣西的州縣城平均規模也較小。¹⁰³ 成一農依據雍乾時期所修各省通志考察清代城市規模，認為各省府級城市平均周長最小的依次是廣西、貴州、雲南、廣東、湖南等。縣級城市周長最小的省份依次是雲南、廣西、廣東、湖南、貴州。¹⁰⁴

由於明代城市規模的研究中統計範圍過少以致太過疏略，尚無可以直接利用的資料。不過，就本文討論的明中葉至清中期的情形看，明中葉的築城運動已經奠定了後世城池規模的基礎，雍乾時所修各省通志中的記載，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明中後期的情形，並作為明清城市規模的參考資料。以下表四即依據成一農先期統計製成。¹⁰⁵ 表中清楚地顯示，雖然有些城隍廟並不一定因為城市規模小而

¹⁰¹ 乾隆《桂陽縣志》卷三，〈建置志〉，頁 1b。

¹⁰² 康熙二十六年（1687）刊《乳源縣志》卷四，〈禮教志·祠廟〉，頁 9b；卷二，〈定制志·城池〉，頁 1b-3b，引文在 3a。

¹⁰³ 詳見李孝聰，〈明、清時期地方城市形態試析〉，武漢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編，《石泉先生九十誕辰紀念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頁 496-536。

¹⁰⁴ 成一農，《古代城市形態研究方法新探》（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頁 126-139。按：用城牆周長衡量城市規模，是現在中國古代城市研究中運用最為普遍的方式。有關探討，見成一農，〈中國古代地方城市形態研究現狀評述〉，《中國史研究》2010.1：158-159。該文對城市規模研究中平均數的運用問題，也作了有益的探討。

¹⁰⁵ 成一農依據光緒間《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一九一〈樂考四·度量衡〉所載換算制度，將長度單位統一換算為公尺。具體為 1 里 = 1800 尺 = 360 步 = 180 丈；一尺約等於今天的 0.326 公尺。為行文方便，本文據此將城周單位統一換算為丈。由於明清營造尺度相差不大，且文獻記述常忽略其間差異，為便於計算，本文同樣不計其間差別。此外，不同地區間尺度使用上的混亂，可能導致雖然單位相同，但實際長度不一的情形。即如康熙間興國知縣張尚瑗指出的，當地無營造尺，匠石皆用織造尺，而後者一尺僅相當於前者七寸五分。見同治《興國縣志》卷四，〈城池〉，頁 2b-3a。雖然張氏所言未必確切，但這種差別是存在的。故而，本文所列相關城市規模，祇是參考性數據。

張傳勇

建於城外，但外廟數與其地城市規模平均數的關係，大致還是可見的。尤其是南方地區。而且，具體到外廟所在治城之規模，的確要比平均數小的多。即以廣西為例，明正德至清乾隆間的 14 座外廟所在治城，有 1 處（上石西州）規模不詳，11 處散州、縣有 9 處低於本省平均規模。其中，低於 300 丈的有 5 處，有 2 處甚至低於 200 丈。（見附表）北方地區一些原因不明的外城隍廟，也可能與所在城池較小有關。比如，山西武鄉（周圍三里許，約 540 丈）、五臺（正統中拓城前周圍二里許，約 360 丈）、河南新蔡（周二里餘，約 375 丈）等均低於所在地區的城周平均值。

表四：清代部分省份城市規模

	府、直隸州城平均規模（丈）	散州、縣城平均規模（丈）
直隸	2642	993
山西	1667	876
山東	1742	1023
河南	1451	1086
陝西	2055	834
浙江	2348	1044
江西	1641	960
湖北	1543	809
湖南	1193	669
福建	1894	843
廣東	1185	619
廣西	789	553
全國總平均數	1594	874

雖然城小未必就會容不下城隍廟，但就上文的情形看，城池太小，將廟宇（包括城隍廟）建於城外的機率就會增大。這可能也是南方地區外城隍廟相對於北方較為集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城池規模也引發了我們的思考：是否所有帶牆空間都可以稱為城？人們對於城之為城，在規模上有沒有一個可以感知的最小限度？在治所初創期或因地理形勢所迫，所建城牆規模很小，甚至以土圍築，周圍祇有百餘丈，面積僅兩個標準

足球場大，其空間祇能容下少數主要官署，這樣的建築，或許以縣牆稱之更合乎實際。從有關的記述看，似乎也有一種不完全將其作為城的傾向。弘治中巴陵縣所築「土城」周圍僅里餘，而後又於街河口、梅溪橋、全家巷、沿河堤諸處創土門。¹⁰⁶ 這似乎表明，諸土門方為預期的城域邊界。《永樂大典·太原縣圖》所示疑似城垣以及志書有關潘原英「改築城池」的記述，或許可以理解為明初確有一座小城。總之，地方文獻對其表述上的不同，表明小（土）城在志書記述中可能會被忽略不計，也說明了人們對這類小城是否為城的認知差異。筆者所見，建於類似「小城」外的城隍廟，為數甚多。由於此類小城性質上的不確定性，以及因城太小導致一些重要衙署也建於城外，在此情況下探討城隍廟與城的內外關係，缺少應有的意義。所以，與此相關的城隍廟不在本文考察範圍之內。

作為一種重要建築，城隍廟的建置方位，在傳統時期不能離開風水的影響。乾隆初年，梁機（江西泰和人）〈興國縣移建學宮碑記〉就提到，興國城隍廟建於北門外，乃是因城內擁擠不得已之舉。不過，雖然是城外，但形勢甚佳，是一塊吉壤。¹⁰⁷ 這樣的說辭，往往是一種事後而發的陳辭濫調，正如後文所議論，在感覺城隍廟應該遷走之前，其地往往是寶地。比如鉛山之例，城隍廟重建於東門外，同治《鉛山縣志》撰者一方面表示這是怪現象，同時又講了一種形家所謂附會之說：「鉛山地脈自聳碧尖蜿蜒七十里，至鳳凰山岡下，融結一大陽宅，乃建縣署。自烏石尖蜿蜒五十里至楓樹隴，過峽融結一大陰宅，乃建城隍廟。」¹⁰⁸ 興業縣城隍廟，乾隆十六年（1751）知縣由東門外遷南門外縣墟之西，但「堪輿家謂居白虎方不利」，乾隆四十四年（1779）知縣遷建城內西北隅。¹⁰⁹ 總體來看，風水與隍廟所處方位有關，但和城牆的內外沒有必然聯繫。

在城隍廟已建的情況下，由於當初建廟時，離縣署較遠，所以，等建城時，不能建造更大的城把城隍廟圈入。或者，城隍廟所處位置不適宜建城，也有可能導致其坐於城外。鳳山縣城隍廟與文廟皆在北門外，成為傳統時期臺灣地區唯一一座外廟，在眾多的探討中，有觀點認為，文廟與城隍廟的位置不在官署建築群當中，「因此在拮据的築城經費前提下，圍城保護縣署等官衙建築之安全自然成為優先考量，此外，築城當時或許也慮及過大的圍城面積並不容易控管等問

¹⁰⁶ 隆慶《岳州府志》卷六，〈軍政考〉，頁又 22a-b。

¹⁰⁷ 乾隆《興國縣志》卷二二，〈藝文〉，頁 52a。

¹⁰⁸ 同治《鉛山縣志》卷六，〈建置〉，頁 10b。

¹⁰⁹ 嘉慶《續修興業縣志》卷二，〈建置〉，頁 6a-b。

題」。¹¹⁰ 福建政和、浙江開化等地，城隍廟與縣治隔溪而建，¹¹¹ 在僅建一套城池時，城隍廟勢必不會圍入城中。

五·外城隍廟觀探析

對於這些建於城外的城隍廟，時人的看法如何，這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從今人的觀點看，不論作為冥官還是城市守護神，城隍神都沒有理由居於城外，實際情況是否如此？考察此一問題，通常需借助兩類資料：一是地方志書，包括其中收錄的碑記文；另一類是以民間故事為中心的文學作品。下文即分別透過這兩類資料，考察其中表現出的有關外廟的觀念。

（一）地方志書的視角

在本文考察的外廟中，有幾座外廟的資料相對集中，或較有代表性，宜先集中分析，以便於後文分類討論時，不致將本來完整的資料，處理得過於瑣碎。

內鄉縣之例 內鄉縣城隍廟建（或為重建）於洪武七年，¹¹² 先在南門外一里，成化間，知縣沃類遷建城內。據王華〈內鄉縣新建城隍廟記〉：成化十五年（1479），沃類蒞任，下車謁廟，「念城隍神，城隍是司。乃不廟食城中，而置於野。是猶主將不居中軍，而越處於外。欲其號令三軍出奇決策以禦侮敵愾，不可得已。慨然有內徙之意」。次年，相地於城內東南隅，方欲興工，遭遇水災。「明年復旱，祈禱不應，歲連儉收，兼之疫癘代作，工不敢舉」。眾人認為，天災相仍，城隍神未加捍禦，「實惟處非其所，神棲弗寧，自我民作，非神咎也」。於是官民捐資出力，於成化二十一年（1485）七月初建成新廟。「自是祈晴禱雨如響應也。歲以有秋」。

¹¹⁰ 林佩諭，〈鳳山縣舊城及周遭聚落變遷之研究（1661-1970）〉，頁 32。

¹¹¹ 政和縣城隍廟舊在縣治東南二十步，明洪武元年（1368）移建縣治南七星溪之南。縣舊無城，弘治元年（1488），始築土牆百餘丈，後改磚築。萬曆四年，由山巔移築半山，周圍八百餘丈，較舊環縮。城址都在溪北。見萬曆《政和縣志》卷二，〈祀典志〉，頁 3b；〈建置志〉，頁 8b-9a；卷前，〈政和縣□里圖〉，頁碼不清；民國《政和縣志》卷二二，〈祠祀〉，頁 5b-6b。開化縣城隍廟舊在金溪之東，縣署則在溪西，因涉水不便，洪武中，邑令建於縣治南。舊廟屢有修葺。舊未築城，正德間以寇亂始築，東臨金溪，周圍二千餘丈。見乾隆《開化縣志》卷二，〈圖說〉，頁 15b-16a, 6b；卷九，〈祠祀〉，頁 3b；卷一一，〈藝文記〉，收錄方豪〈修城記〉，頁 13a-14b。

¹¹² 成化《河南總志》卷六，〈南陽府·祠廟〉，頁 24b。

內鄉縣城隍廟的內徙，與沃知縣本人密切相關。在沃知縣觀念中，城隍神乃「城隍」之神，就像主將應居中軍方能運籌帷幄、號令三軍一樣，城隍神豈有建廟於城牆之外而能靈應顯佑的道理？城隍廟在最終確定內徙之前的「祈禱不應」，與內徙後的祈禱有應，兩相對照，更加印證了城隍居非其所會影響其靈應的觀點。而翰林修撰王華在記文中也認為，城隍廟遷建城內，神靈乂安，將保障斯民，捍災禦患：

予惟我太祖高皇帝稽古定禮，盡廢淫祠，而惟諸郡縣城隍廟及社稷山川壇獨存。誠以城隍之神庇內捍外，保障一方，而功與社稷山川等也。崇之奉之，宜其至矣。而內鄉之城隍廟，處非其所，神棲弗寧。如此，其何以望其災患是禦，庇內捍外，以保障我民也歟！此君之所以必徙之也。廟既徙矣，神棲寧矣。吾見宜暘而暘，宜雨而雨，而內鄉之民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矣！¹¹³

興國縣之例 興國縣初設於宋太平興國年間。邑廟始建不詳，乾隆《興國縣志》謂「宋時創始，歲月無考」，¹¹⁴ 舊在北門外儒學左。乾隆三年（1738），遷城內大乘寺左，以其址建文廟。知縣徐大坤〈興國縣城隍廟記〉：

興國城隍廟舊在城外學宮左。余既蒞任一載，感神之靈，嘉惠我黎庶，縣令無以答神庥，願廟久且弊，詢諸父老子弟，僉曰宜遷。乃告於神，敬遷神之廟於城內縣令署北大乘寺外殿，以舊廟址擴而為學宮。於是縣令得時對越於神，縣令居南，治其陽，神居北，治其陰。縣令有缺，遺怠於政，神則聞之。神有所賞罰，令敢代為神執柄。縣令與神職相若，治相同，今居又相近，協力以保民，庶幾父兄子弟春耕秋刈，笑語歡樂，時聞於畎畝，而永安於無事，則神之靈果赫然矣。¹¹⁵

據此，此次遷建，乃因隍廟年久失修。但事實上，遷建隍廟的初衷並不在此。梁機〈興國縣移建學宮碑記〉云：

興國為贛之重鎮，自宋太平興國間置縣而即有學，初建南門外，後遷北隅。明初高帝勅天下學校並置生徒，又詔郡縣皆立城隍廟。而興山國也，城內民居庫淺，衢巷不能旋輿馬，故少敞豁地。而城勢北高南下，從北阜

¹¹³ 以上引文均出自成化年間王華，〈內鄉縣新建城隍廟記〉，康熙《內鄉縣志》卷九，〈藝文志下〉，頁 4b-6a。

¹¹⁴ 乾隆《興國縣志》卷六，〈壇廟〉，頁 3a。

¹¹⁵ 乾隆《興國縣志》卷二二，〈藝文〉，頁 62b。

望城南諸山，蔚然秀拱，蓋吉壤也。以是宋時遷學於此，其後城隍廟之建，遂並列焉。更二百餘年，中間賢在事於學廟修葺遷移者屢矣。一遷治平觀，再遷大乘寺，或毀兵寇，或地不稱。至明末更定，計無如北隅者，乃復即城隍廟右舊址建焉。……今上乾隆二年丁巳秋，三楚徐侯來蒞茲土，……因相度其高下，以為學宮地稍窪，不如城隍之雄踞高阜，儼若而有臨也，思以易之。又念城隍亦后土之類，等於地祇。在禮，坊、水庸、郵、表、啜，皆在祀典。而城與隍所以域民衛物，捍外集內，其功較八蜡尤大，其廟祀宜在國中，不容以或苟。顧所謂大乘寺者，巨剎也，直縣廡之後，移而建之，則依然穆穆之高居焉，且掃浮屠之詭跡，而鎮以金湯之明神，又至教矣。¹¹⁶

城隍廟自洪武初建於北城外，與文廟比鄰。當年文廟建於此地，乃因城內擁擠，無地可建，而此地高敞，攬盡一城風水。所以，將城隍廟建於此地，大概也有這樣的考慮。後來，文廟屢次移建，均未獲善地，至明末又遷回城北舊址，仍與城隍廟比鄰。但人們仍然對文廟居址不甚滿意。乾隆二年（1737），徐知縣謁廟時，一下看出問題所在：文廟地勢不如隍廟，有受壓制之感，於風水不利。¹¹⁷於是把城隍廟遷到城內縣署之後、大乘寺旁，這個位置，同樣被認為十分恰當：作為「城隍」之神，「其廟宜在國中」；作為陰司府署，與縣署前後相接；作為明禋正神，居浮屠左近，也可有裨世教。而從地理上說，地勢較高。如此，更合於城隍神奉祀之意。可謂盡於善矣。

良鄉縣之例 良鄉縣城隍廟舊在縣治西南隅，明景泰二年（1451）新築城垣，廟遂在城外。景泰六年，主簿鄭智請於知縣賈禩，改建城內西北隅。〈良鄉縣創修城隍廟碑〉（景泰七年）云：

縣西南隅舊有城隍廟在焉。景泰二年，因始築城，而廟乃隔於城之外。縣大夫及民庶有事廟下者，咸謂不便。且地勢庫隘，棟宇傾頽，所以妥奉神靈者，亦弗稱焉。諸官僚酌應紛紜殆無虛日，雖欲修葺移徙，莫或遑也。潯陽鄭公智來為主簿，焦神勞力，以佐庶務，方欲銳然經理，深慮勞民費

¹¹⁶ 乾隆《興國縣志》卷二二，〈藝文〉，頁52a-b。

¹¹⁷ 乾隆《興國縣志》卷四，〈學宮〉，頁2a：「乾隆戊午，徐令大坤因形家言以城隍廟址為吉，合紳士耆民議定改建城隍廟於大乘寺左，而以其基建文廟焉。」卷二二，〈藝文〉，頁50b-51b 所收乾隆二年江西學政趙大鯨〈重建興國縣學記〉也說：「先是，學址屢遷，俱未獲善地，徐令周視陰陽，謂城隍與勾龍等祀，巋然居文廟上，非制也。因移置縣廡後，而即其處為妥聖靈地，釐序由是改觀。」

財。乃謀於知縣賈禴，縣丞馬驥、李謙，典史陳永通，曰：「竊聞政之體在治民事神而已。吾儕神所當事者，莫要於城隍也。凡祀社稷、山川、雷雨，皆以城隍為配；水旱疾疫禱禳，皆以城隍為先。而其廟置於城之外，無乃不可乎！」賈公然之，馬、李諸公佐之，爰擇地於城內之乾隅，袤廣計之，總若干尋尺，先捐己俸為之倡，好善樂施者翕然傾助。¹¹⁸

以上是就內鄉、興國、良鄉三地外廟所作的探討。

由地方志的敘述來看，首先讓我們感受到的是一種帶有普遍性的心理趨向，即外城隍廟是少見且令人奇怪的。沃類初見內鄉縣城隍廟，第一感覺就是不正常，遂有內徙之意。同治《鉛山縣志》撰者為本縣城隍廟所加按語「郡邑城隍廟皆在城內，惟鉛邑遠在東關，中隔樵水，見者怪之」，¹¹⁹ 則突出了本地外廟的唯一性。康熙《嶧縣志》卷前〈嶧縣城圖〉特別標示出坐於郊關間的城隍廟，也強調「亦諸邑所無者」。¹²⁰ 相較而言，宣德五年（1430），李禎在吉安府城隍廟記文中，則沒有講的那樣絕對：「天下郡縣城隍廟多在城內，而吉安廟乃在城外西街之岡上。」¹²¹ 當然，也有清代方志如光緒《臨朐縣志》指出「明制郭外多有城隍廟」，但其出發點卻是說明，東郭外的孫公祠在明代稱東城隍一事不足為奇。¹²²

這種奇怪感覺，主要源於城隍神自身的角色。唐代以來，城隍神兼具冥官職能，所以，當康熙二十六年（1687）文昌縣知縣何斌將北門外的城隍廟遷於城內舊址時，在記文中有如下說明：「文邑神廟舊在北門外，禱祀者多遼闊弗親，覺與邑令親民之意，內外懸絕。」¹²³ 興國縣城隍廟由城外遷於城內大乘寺左，徐大坤在記文中藉此對城隍神與地方官，以及城隍廟與衙署的關係，做了一番議論：「於是縣令得時對越於神。縣令居南，治其陽；神居北，治其陰。」¹²⁴ 新址在縣署後，與縣署南北相對，分治「陰」「陽」，合於幽明共治之義。這是遷址後對兩者關係的評論，遷址之前，城隍廟尚處城外時，是否會由此影響到地方官的祭祀，以及是否會影響到城隍神的靈應，都沒有談到。

¹¹⁸ 光緒《良鄉縣志》卷八，〈藝文志〉，頁 28a-b。

¹¹⁹ 同治《鉛山縣志》卷六，〈建置〉，頁 10b。

¹²⁰ 康熙《嶧縣志》卷前，總頁 344。原文為：「縣城圖：仍嶧州故址，改築西南隅。其儒學、城隍廟舉坐郊關間，亦諸邑所無者。今並圖故城，庶無漏缺，足觀覽焉。」

¹²¹ 光緒《吉安府志》卷八，〈建置志〉，頁 11a。

¹²² 光緒《臨朐縣志》卷五，〈建置〉，頁 17a。

¹²³ 何斌，〈重修城隍廟碑記〉，康熙《文昌縣志》卷一〇，〈藝文志〉，頁 263。

¹²⁴ 徐大坤，〈興國縣城隍廟記〉，乾隆《興國縣志》卷二二，〈藝文〉，頁 62b。

這樣的例子倒是有的。唐代以來，城隍廟便成為地方官拜謁的諸神廟之一，¹²⁵ 明洪武中又定制，官員朔望謁廟。對於城外的廟宇，官員往往感到不便。在良鄉縣，因廟在城外，「縣大夫及民庶有事廟下者，咸謂不便」。江西臨川縣城隍廟原坐順化門外，康熙十八年（1679），知縣胡亦堂因廟傾圮，「且城外展謁未便」，遂尊奉城隍神於城內。¹²⁶ 崇義縣城隍廟舊在城北，嘉靖癸未年（1523）遷於城內，嘉靖《南安府志》敘述其因：「兵備副使林大輅巡部至邑，以廟隔溪病涉，乃命通判汪集遷於城內嶺北道之後。」¹²⁷ 此外，良鄉縣主簿請於縣內諸官遷廟，則從城隍神在官祀諸神中的重要位置入手，論證「其廟置於城之外，無乃不可乎」！

本應建於城內的城隍廟，卻建在城外，或認為於神不敬。金皇統五年（1145），雲陽縣將城外西南隅的城隍廟遷建城內西北，武戡記謂：「觀其舊廟，既居城郭之外，而且歷歲甚久，棟宇圯剝，階危隳頹，以至繪塑之事堙沒蕭疏，殆非昭事寧神之所。」¹²⁸ 又或者以隍神在城外於禮不合。乾隆年間，上思州知州董秉純〈上思州移建城隍廟碑記〉謂：「夫以一州之福主，不得正位中城而僻處荒郊，其不合祀典理最易明。」¹²⁹

由於處非其所，就會影響到神的靈驗。內鄉縣的例子恰能說明這一問題：在城隍廟遷入城內後，城隍顯靈，此前的災害都沒有了。康熙十八年，臨川縣城隍廟遷入城內，知府陳洪諫的記文敘及遷廟前邑中紳士及父老之言：「吾邑隍廟暴處郭外，且棟圯榱裂，怨恫久矣。今合眾志捐費以為告虔薦馨之所，神必我據。」¹³⁰ 同樣反映了人們將城隍神廟宇位置的不恰當與其靈應不著聯繫起來的觀念。

不過，這可能祇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居於城外的城隍神，其靈驗與否，乃此一時彼一時。興國縣將城隍廟遷於城內，其初衷或許並不是為了城隍神本身，但

¹²⁵ 參雷聞，《郊廟之外：隋唐國家祭祀與宗教》（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246-250。

¹²⁶ 同治《臨川縣志》卷一五，〈建置·壇廟〉，頁10b。

¹²⁷ 嘉靖《南安府志》卷一二，〈祠祀志〉，頁28b。

¹²⁸ 宣統《涇陽縣志》卷二，〈地理志下·金石〉，頁33a。按武戡記於「乙丑」年，當為皇統五年。

¹²⁹ 董秉純，《春雨樓初刪稿》（收入《四明叢書》，民國二十五年〔1936〕刊本），卷一，頁18a。

¹³⁰ 陳洪諫，〈臨川縣改遷城隍廟碑記〉，同治《臨川縣志》卷一五，〈建置·壇廟〉，頁11b-12a。

遷址後的結果，卻是極好的。四川大邑縣城隍廟也有類似的情形。嘉慶二十年(1815)，知縣李錫書將城外城隍廟與城內文昌宮互易。其緣由，李氏〈文昌宮遷廟祝文〉說，文昌神本是興文教的，可是由於「廟建城中坎位，未煥光明」，於是，「謹協眾議，請迎神座於城外靜惠山之麓，以舊日之城隍廟易為帝君之廟」。¹³¹ 那麼，於文昌宮風水有礙，於城隍廟就無礙了？不過，就李氏言論來看，這是兩全其美之事，二者各得其所。李氏〈城隍廟遷廟祝文〉講述了遷廟的緣由：神乃一地冥官，負有保城護民之責，但因建於城外，不能盡職盡責：「惟是舊廟建置城外，祀於北郊，以地而論，則親民之職當近隍垣，以理而言，則守土之官不離城郭。」改建於城內後，可以預期，這種狀況將得到改善。¹³²

但是，那些沒有遷入城內的城隍廟，廟神依然靈應，似乎並未因為坐於城外就影響到靈驗。萬曆乙亥年(1575)，郴州重修城隍廟，知州胡漢在記文中記述了城隍神的靈應：「今年春，虎在郊外日搏人犬斃，余以為致患在守，因閉閣自訟。人有告者言，郴城隍素稱靈應，盍往禱之？余齋沐往告，告之夜，虎垂尾遁去。民謹呼，謂神貺若桴鼓，在余亦謂神昭昭矣。」¹³³ 在濬縣，嘉靖末年知縣魏廉川重修城隍廟，李道焯在記文中說，促成這次行動的，是嘉靖乙丑年(1565)邑神的顯應，置劫匪於法。不久，魏知縣到任謁廟，從守廟道士那裏盡得其詳，「且及平日靈異之感數事」。知縣慨然道：「(城隍)靈應昭昭，而廟宇弗廣，神其示我乎而弗舉，政將奚先？」於是捐俸重修。¹³⁴ 光緒十四年(1888)，湖北興國州城隍也以「靈應素著，每遇地方水旱疾疫，虔誠祈禱無不立應」，由紳耆聯名稟請頒賜匾額，當年獲頒匾額曰「惠周鄂雉」。¹³⁵

甚至有些地方認為，外廟所處之地為善地，所以靈應昭著，至於是不是外廟，則無關緊要。萬曆年間，四川雅州進士李向陽〈重修(大邑縣)城隍廟碑〉：「霧邑界川西南，城隍廟獨遠枕山麓，俯瞰城封，故靈德英威冠諸邑。」¹³⁶

¹³¹ 同治《大邑縣志》卷一八下，〈文類〉，頁22b。

¹³² 同治《大邑縣志》卷一八下，〈文類〉，頁23a-b。

¹³³ 萬曆《郴州志》卷一二，〈秩祀志〉，頁3b。

¹³⁴ 嘉慶《濬縣志》卷六，〈建置志〉，頁49a-b。

¹³⁵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摺(第27輯)》(北京：中華書局，1995)，〈奏為興國州城隍靈應顯著請旨頒賜匾額事〉(光緒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頁858。原無標題。《清德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7，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本影印)，卷二六二，光緒十四年十二月辛巳，總頁518下。

¹³⁶ 同治《大邑縣志》卷一二，〈金石〉，頁11b。

張傳勇

康熙間信豐縣令張繼掄在為重修城隍廟所作記文中，也對外城隍廟所在形勝作了描述：「信邑城隍之祠，北枕交流，南環疊嶂，據山川靈秀之勝。」¹³⁷

乾隆間澄城知縣額樂春重修城隍廟，他對建在城外的城隍廟，也認為於城隍崇祀之意，似有未當。不過，他又力圖說明，居於城外，並不會因此妨礙城隍神靈驗的發揮。外城隍廟無可怪異，他說：

然而四境之內，官統其明，神統其幽。今州縣之署，往往有在城外者，況以神之靈，雲旗風旆，無乎不之，儻來忽逝，焉有定所。可城內，何不可城外者！¹³⁸

這可能是額樂春有感而發。他接下來在記文中講述了隍廟的歷史——明洪武初曾在城內建新廟，但民情仍依舊廟，新廟旋廢，嘉靖中遂重修舊廟——實有為其修廟提供正當性之意。

從上面的分析看，對於城外的城隍廟，似乎當人們想要遷建時，總會找出一大堆理由說明外廟的不正當，但在此之前，幾與內廟無異，該顯靈就顯靈。另外，從地方官與地方人士的角度，他們對外城隍廟的觀感，經常影響到外城隍廟是否繼續坐落城外。外城隍廟往往在經歷或長或短的時間後，被遷入或被圈入城內，從而「正常化」為城內的城隍廟。當然，在此排除了各種客觀因素，比如經費的限制、城池太小等。

以上各種說法，或出於地方紳耆，或出於地方官員，可以視為文人士夫的觀點。民俗的看法又是如何？下文將從文學作品中有關的城隍廟故事入手，集中探討這一問題。

（二）文學作品的視角

有關外城隍廟的故事，古已有之。清初佟世思《耳書》「吉安府城隍廟」條，記載了吉安府城隍廟何以建於城外：

文文山先生幼與同輩讀書廟中。時同輩偶有失墨者，齊禱神前，以琰之下者定竊人。先生得下琰，因捉筆書「城隍不明，貶去千里，文天祥題」十二字於神背。是夜，吉安守夢城隍語其事，且囑代懇文先生。時先生甫十有餘歲，守不知神所稱文先生者為何人。後於廟中訪得先生姓名，乃以神語告先生。先生為易千字以十字。守知先生非凡品，不復瑣瑣於先生，爰

¹³⁷ 康熙《信豐縣志》卷一二，〈藝文志〉，頁74b。

¹³⁸ 額樂春，〈重修城隍廟記〉，乾隆《澄城縣志》卷六，〈廟屬七上〉，頁3a。

私易步弓減半以量之。故至今吉安城隍廟在府治五里外。¹³⁹

現代民間故事與此大同小異。總體來看，其基本結構主要有兩類，一是城隍犯錯，或出現冤假錯案，或徇私舞弊，被異人發覺，受到懲罰，搬到城外。另一類則是被人發現後，稟明城隍的上司——天帝，城隍受罰，逐出城外。相較而言，前者更為流行。民間文學研究將這一類型的民間故事歸納為「攆城隍·遷廟型」，認為歷來的城隍傳說內容皆是以宣揚城隍神威，歌頌城隍神的功德為主，「攆城隍型」故事則表現出對城隍神的嘲弄或抨擊，這是城隍故事前所未有的新類型，具有特殊意義。¹⁴⁰ 那麼，在此基礎上，是否可以藉由這一類型的故事進一步揭示與外廟有關的信仰觀念？

前面講到，城隍廟建於城外，通常有其客觀原因，很多外廟的形成，並未經歷由城裏到城外的位置上的移動，相反，有些城隍廟本在城外，後來才遷入城裏。比如吉安府外廟，沒有證據顯示它在位置上存在城內到城外的變動，但民間傳說敘事中，該廟原本是在城內的。由此看來，城隍廟為何建在城外，人們並無意深究，他們祇是看重建於城外的事實，然後，以慣常的思維模式，推得一種或幾種類似上文的說法，解釋城隍廟因何由城內遷往城外。

這些同類型的故事，在如此廣大的地域上存在，如果我們不考慮它可能存在故事源頭以及地域間的流傳的話——實際上，以現有的資料，從事這樣的研究幾無可能——可以將故事理解為，不同地域之間在擁有相同的信仰背景下，面對建於城外的城隍廟時，自然得出的說法。或者，本有一種類型的說法流傳，當一地出現外城隍廟時，就很自然的與地方性知識相結合，成為一種本地敘事。

這類故事需要留意之處是，城隍居於城外，是因為犯了錯誤，而領受的一種懲罰。這就表明，正常情況下，城隍本不應建廟於城外。城隍居於城外，與陽世的流放極為相似。祇是，流放地與本居地僅有一牆之隔。在有關的故事中，城隍領受的懲罰，本是極遠之地，比如文天祥判吉安府城隍「貶去千里」等等，但最終，這樣的距離要折扣，或易千為十，或者如何如何，城隍流放的最終地點通常是距城牆不遠的地方。這樣的故事安排，其實大有用意。作為冥官的城隍神，所轄地域範圍大致與陽世地方官相當，正常情況下不可能出現甲地城隍無故管理乙地，或甲地城隍寓居乙地辦公的情形。所以，除非將犯錯的城隍革職拿辦，否則，以戴罪之身仍居其職的城隍，不宜貶至本地轄區之外。

¹³⁹ 佟世思，《耳書》（康熙四十年〔1701〕佟世集刻本），頁10b-11a。

¹⁴⁰ 前引顧希佳，〈「攆城隍型」故事的比較研究〉，頁99。

就現代「遷廟型」故事的敘述對象看，不僅城外關廂的城隍廟，其他不在治城的城隍廟，都有可能成為這一故事的敘述對象。一九三〇年代，J. K. 施賴奧克在其考察安慶宗教現象的著作中，記錄了一則懷寧人劉若幸受冤，通過玉皇大帝將縣城隍放逐的故事，解釋距安慶城十五里的三口鎮（按：應為山口鎮）為何建有城隍廟。¹⁴¹ 河北固安〈楊狀元與城隍〉的故事，則以縣城隍遷廟解釋牛駝鎮城隍廟的由來。¹⁴² 此外，建於鎮城外者，如遵化鐵廠鎮城隍廟，也存在這一類型的故事。¹⁴³ 這就表明，處於城外的城隍廟，不論在城外何處，在何城之外，都傾向於套用「遷廟型」故事作為解釋框架。不過，就山口鎮與牛駝鎮的情形看，似乎並不表明所有村鎮城隍廟都是外廟，而祇是用以解答其本身的合理性問題：城隍廟本在治所，因何建於村鎮？¹⁴⁴

從根本上，遷廟型故事所反映的，是一種以表現「奇怪」為核心的心理趨向。有關的外廟傳說，總要在開頭提出這樣的問題：按照規定，城隍廟本應建城內，為何本地城隍廟獨一無二的建於城外？成為遷廟型故事的重要敘事模式。¹⁴⁵ 怪從何來？前文的統計表明，平均每二十座城隍廟中就有可能存在一座外廟，這一數據能說明什麼？前引方志中「諸邑所無」、「獨在城外」之類說法，可能與此有關，是比較的結果。但僅以「少見多怪」概括也似有未當。我們當然可以說，傳統時期，民眾的視野相對狹窄，這在一定程度上讓他們面對一座建於城外的城隍廟時，難免產生困惑，表現出強烈的好奇心。但外廟的多少，和人們對外

¹⁴¹ 施賴奧克 (John Knight Shryock) 著，程曦譯，《近代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安慶的寺廟及其崇拜》（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頁 121-122。

¹⁴² 白庚勝主編，《中國民間故事全書·河北固安卷》（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頁 30-31。

¹⁴³ 鐵廠在明代已建城，見康熙《遵化州志》卷三，〈建置志〉，頁 2a。鎮廟建置不詳，有關故事見於李美山，〈昔日的古城鐵廠〉，政協河北省遵化縣委員會編，《遵化史話（第 4 輯）》（遵化：遵化縣印刷廠，1987），頁 136-137。

¹⁴⁴ 明清時期，村鎮城隍廟的合理性問題是一個備受關注的話題，很多地方都有一套說辭，以證明本地城隍廟建於村鎮是合乎情理的。有關這一問題的考察，參濱島敦俊著，沈中琦譯，〈明清江南城隍考——商品經濟的發達與農民信仰〉，《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1：39-49；申浩，〈明清民間信仰視域中的江南社會〉，《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2：67-68。

¹⁴⁵ 即如一則鉛山民間傳說在開首所講的，「城隍，城隍，一城之王。往年各地的城隍廟都一律建在城裏的中心地段，以便管事。稀罕的是，鉛山縣故治永平鎮的城隍廟卻由城裏拆遷到城外東南角一處偏僻的地方」。見費文中，〈城隍廟的故事〉，俞惕生、俞怡生主編，《冠蓋里：江西鉛山費氏科第世家尋蹤》（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5），頁 119。

廟表現出的奇怪，兩者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因為，單就坐於城外的城隍廟而言，本身就是值得奇怪的。而且，從「遷廟型」這一解釋性的傳說，我們也看到了民眾信仰觀念中，對所信奉神祇以「獨特性」視之的心態：僅此一處，他處所無。這種心態在民間敘事中還表現為：在同級別的城隍中，封爵最高，廟宇最為宏大，儀仗最為華麗，強調的是獨一無二。

外廟故事大量見於當代民間故事集，在舊文獻和舊方志中卻較少出現。除《耳書》所載吉安府城隍廟外，筆者見到的是湖南衡山之例。道光《衡山縣志》記載：

城隍廟在邑南門外，俗傳廟舊在城內。明茹瑺幼時讀書其中，為儕輩所誣。矢於神以求剖，不應，戲書片紙罰居城外。神示夢於令云：居城內不得自安，當移廟。令乃諭邑人共移出之。

對於這樣的說法，志書作者並未完全認同：「按俗說未可深信，移廟當別有故，今不可考。」¹⁴⁶ 這一故事，可能在更早的時間就已出現，康熙年間，蕭士熙〈重修城隍祠記〉提到尚書茹瑺少年時「以神忤其意，戲為文欲黜之」，但後來城隍神通過關係與茹瑺取得和解，並未出現遷廟的一幕。蕭士熙評論道：「夫（城隍）神果（明）太祖奉之而尚書顧能黜耶！矧為童子時耶！誕甚矣。」¹⁴⁷ 認為荒誕不經。很顯然，對於外廟故事，如果認真追究起來，都是經不起推敲的。

綜上，儘管自唐以來各地普遍建起城隍廟，不同階層的人們共同信奉著同稱為「城隍神」的信仰，但是，並不能假定所有人觀念中的城隍形象是一致的。對於一座外廟而言，它何以建於城外，以及當地人士的看法，其實大有不同。由於文獻所限，我們尚不能確切地知道有關認識是否具有地域性，以及各種認識與外廟成因之間有多大的聯繫。

六·餘論：「城隍」與城隍廟

城隍神自見諸歷史文獻以來，即與城池關係密切。雖然它是否起源於城池崇拜尚無定論，但傳統時期的主流觀念，認為城隍神即城市守護神，求其起源，自先尋求「城隍」的源起。反映到城隍廟的建置上，往往強調它與城牆的聯繫，認為應當建在有城之地。其建置方位，也多與特定的信仰觀念有關。城內的建置方

¹⁴⁶ 道光《衡山縣志》卷一七，〈祠廟志〉，頁16b-17a。

¹⁴⁷ 光緒《衡山縣志》卷一九，〈壇廟〉，頁24a。

張傳勇

位有不同說辭自不待言，對於建在城牆之外者，從城隍神崇祀之義來看，則是不應該的。

上述觀念，毋寧被作為一種「觀念的真實」。在實際的建置當中，城隍廟與城牆並沒有如此緊密的聯繫。建在帶牆城市中的城隍廟，僅是唐宋以來城隍廟建置諸側面中的一種。城隍廟須建於城內，也是如此。民間文學資料呈現給人們的圖景是，外城隍廟本身就是奇怪的，這一狀況的形成，是城隍廟遷出的結果——反過來同樣告訴我們：城隍廟本來「合乎規定」地建在城內。這樣的觀念，影響極為廣泛。人們從來不曾認真思考，民間文學資料涉及的外城隍廟，往往是延至民國以後者，整體數量十分有限。以此考察外廟，有其侷限性。當我們利用以地方志書為主的歷史文獻，從更大地域範圍進行考察，外城隍廟就會呈現出多元的變化過程或解釋。比如，很多外廟的形成並不是由城內遷出的結果，它們在一定時期內並沒有位置上的移動，但最後還是成為了外廟；甚至於，一些城隍廟在建造之初，即在已先建成的城牆之外。再如，就明中期到清中期這一時段而論，外廟的數量大約佔到總數的百分之五左右。雖然沒有一個可供參考的標準，這一數值的意義並不容易判定。不過，僅就此而言，外廟的絕對數一定可以衝擊人們頭腦中固有的「奇怪」感。

本文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外廟在歷史時期的狀況，敏銳的歷史學者傾向於進一步追問：外城隍廟有無時段性的變化？引起這些變化的原因是什麼？就本文的研究而論，頗有些令人失望。雖然說，作為中國傳統城市形態主要構成要素的城隍廟，其分佈形態的歷史與傳統時期築城史密不可分，沒有城（包括各種類似城的柵，或城的一部分比如城門），外廟無從談起。城池的變動，是導致外廟出現或終結的一大因素。但是，城池的變動並不必然影響到外廟。更重要的是，相比於城池，外廟的數量相對較少。因此，如果說城池的修築還可能會出現階段性的變化，那麼就外廟而言，個別地區能夠或多或少反映出地方社會的變動。但總體來說，很難尋到這些現象中的規律性。

（本文於民國一〇五年一月十八日收稿；同年十月二十日通過刊登）

後記

本文承蒙常建華教授、彭勇教授、劉永華教授、羅艷春博士等師友以及兩位匿名審稿人惠賜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附表

部分地區外城隍廟統計

序號	地點	時段	基本情況
1	直隸良鄉	景泰二年至六年	見前文。
2	青縣	洪武初以前至民國	廟始建未詳，洪武初在城東衛河西岸。青縣城，宋置土城，周回五里，後傾圮。成化時僅存遺址，乃重建。洪武初，建衙署於城東一里衛河西岸，又將儒學由城中遷至此處。至隆慶戊辰縣署移建城內。 ¹⁴⁸ 推測洪武初或有將城池東移之意，後竟未果。縣署遷城內，儒學、城隍廟俱坐城外。
3	靜海	康熙前至民國	嘉靖府志：廟「在縣治西南」。萬曆府志未載，康熙十七年刊府志所載與嘉靖府志同。康熙邑志則記為「在南關西」，萬曆二十四年重修。同書載圖顯示，廟在城外。 ¹⁴⁹ 其後相沿未改。靜海縣城，嘉靖府志記為土城，周回六里。康熙邑志引述這一記載後說：「其建置於何年，遠不可考。今惟據見在基址，周回三里奇一百八十步。」這就存在一種可能：若嘉靖府志所載城周為修志時的情形，則在嘉靖間或之前，廟在城內西南方，迨城池收縮，廟隔城外。 ¹⁵⁰
4	山西武鄉	萬曆前至民國	廟在西關外，始建不詳，萬曆間重修。 ¹⁵¹
5	岳陽	康熙前至民國	城隍廟在南關，康熙三十年重修。邑城，「成化二年溫家溝水漲，將南面一半沖壞，而城非復舊制」。雍正時，城周二里一十二步。 ¹⁵²

¹⁴⁸ 嘉靖《河間府志》卷九，〈典禮志〉，頁 5a；民國《青縣志》卷四，〈輿地志〉，頁 29a；康熙《青縣志》卷四，〈藝文〉錄劉春〈青縣重修城碑記〉，頁 9b；同書卷一，〈建置〉，頁 6b-8a。

¹⁴⁹ 嘉靖《河間府志》卷九，〈典禮志〉，頁 6a；康熙《河間府志》卷一〇，〈祀典〉，頁 9b；康熙《靜海縣志》卷四，〈壇廟志〉，頁 8a；同書卷首，〈縣治圖〉，頁 2b-3a。

¹⁵⁰ 嘉靖《河間府志》卷二，〈建置志·城池〉，頁 7a；康熙《靜海縣志》卷一，〈分野志·城池〉，頁 3a。

¹⁵¹ 康熙《武鄉縣志》卷二，〈壇廟〉，頁 1b。

¹⁵² 雍正《岳陽縣志》卷三，〈建置志〉，頁 6a, 1b-2a。

序號	地點	時段	基本情況
6	五臺	洪武初以前至正統間	《永樂大典》引《太原志》：隍廟「在縣西」。又有〈五臺縣圖〉，顯示隍廟在西城外，文廟在其左。圖中又有風雲雷雨山川壇，知其反映的是明初情形。 ¹⁵³ 至康熙邑志則載隍廟在城西門內，文廟仍在其左。 ¹⁵⁴ 五臺縣城據載始築於元魏，周回初僅二里許，正統間張智展築其西，至三百二十步。 ¹⁵⁵ 乾隆邑志載學宮沿革，「初在城外西南隅，明正統十四年張智拓修城垣，徙建於縣西南」。 ¹⁵⁶ 所謂徙建，當為圈入。城隍廟也應於此時圍入城內。
7	歸化城廳	雍正間至民國	城隍廟在北門外，雍正中建。歸化城，萬曆間築，周二里。 ¹⁵⁷
8	山東濟南府	同治九年前	濟南府城隍廟改易為省督城隍廟後，府城隍之祀闕如，郡人私奉像於南城外老君堂側廡以祭祀。 ¹⁵⁸
9	歷城	嘉慶十五年至道光六年	嘉慶十五年立廟於南門外玉皇宮左，為民間私祀。道光六年，知縣改創於城內廣豐倉之西。 ¹⁵⁹
10	恩縣	成化三年至民國	見前文。
11	滋陽	萬曆四十六年前	始建未詳，舊在東關外，萬曆四十六年改建城內西南隅。見前文。
12	嶧縣	洪武二年至清末後	在北門外。見前文。
13	青州	洪武初至民國	見前文。
14	臨朐	元至正元年前至民國	東城隍廟，創始無考，元至正元年（1264）重修。 ¹⁶⁰
15	膠州	洪武二年至民國	明以前不詳，洪武二年建於西關外。見前文。

¹⁵³ 馬蓉等，《永樂大典方志輯佚》，頁 229, 3278。

¹⁵⁴ 康熙《五臺縣志》卷三，〈建置志〉，頁 13b, 6a；卷一，〈圖畫志〉，頁 2b。

¹⁵⁵ 光緒《五臺新志》卷一，〈城池〉，頁 11a-b。按：頁 13a 載康熙元年楊瓊枝修城碑記云，張智展築城垣，「周回三里許」。

¹⁵⁶ 乾隆《五臺縣志》卷三，〈建置志〉，頁 5b-6a。

¹⁵⁷ 民國《歸綏縣志》，〈建置志〉，頁 1a；〈神教志〉，頁 9a。

¹⁵⁸ 民國《續修歷城縣志》卷一四，〈建置考·壇廟〉，頁 1a-2a。

¹⁵⁹ 民國《續修歷城縣志》卷一四，〈建置考·壇廟〉，頁 2a-3a。

¹⁶⁰ 光緒《臨朐縣志》卷九下，〈藝文〉著錄至正元年〈城隍廟記〉，頁 23b；民國《臨朐續志》卷一五，〈禮俗略〉，頁 19a。

序號	地點	時段	基本情況
16	河南蘭陽	景泰以前	洪武元年徙治馬村，依舊城修治。邑廟始建未詳。嘉靖邑志：舊在城西半里許，景泰庚午遭火。知縣遷於城西門內。 ¹⁶¹
17	洛陽	順治前至清末	在西城外。始建不詳。
18	鞏縣	一九二〇年代	舊在縣南街，民國七年毀於水災，縣民捐資新建於南關外。不久，改為他用。 ¹⁶² 十七年縣治遷東南里許之鰲嶺。
19	澠池	崇禎十年至康熙二十年	廟舊在縣治西，崇禎十年截去西城，遂坐西城外。康熙二十年義民有世祚募建西門內。 ¹⁶³
20	嵩縣	洪武三年至民國	洪武三年截去西城，遺城隍廟於西門外。
21	濬縣	洪武初至民國	廟在浮邱山上，洪武初治城徙西北平地，廟坐南門外。嘉靖間兩度拓西南一隅，騰跨岡阜；萬曆二年重修，包浮邱山之半於城內。 ¹⁶⁴ 隍廟一直在城外。
22	內鄉	洪武七年至成化二十一年	見前文。
23	新蔡	嘉靖壬午前	舊在通淮門外。嘉靖壬午，邑人捐貲遷建城內東北隅。 ¹⁶⁵
24	陝西雲陽	金皇統乙丑前	舊在城外西南隅，原因不詳。金皇統乙丑移建城內西北。
25	寧陝廳	嘉慶三年至民國	廟在城外東北河洲中，乾隆五十年建。寧陝舊無城垣，嘉慶三年築土堡。十九年重修，周五百餘丈。 ¹⁶⁶
26	澄城	元後至元四年前至民國	見前文。
27	佛坪	道光七年至民國	廟在東關城外，道光七年建。廳城建於道光五年，周長三百九十五丈餘。 ¹⁶⁷

¹⁶¹ 嘉靖《蘭陽縣志》卷三，〈建置志〉，頁 6b。

¹⁶² 民國《鞏縣志》卷六，〈民政·建置〉，頁 6a；陳全智、劉慶昭，〈鞏縣老城示意圖說明〉，鞏縣志編纂委員會總編輯室編，《鞏縣文史資料（第 9 輯）》（內部資料，1983），頁 5。

¹⁶³ 乾隆《澠池縣志》卷前，〈澠池縣境之圖〉、〈舊縣治之圖〉、〈新縣治之圖〉，頁 1b-4a；民國《澠池縣志》卷六，〈民政〉，頁 1a, 9a。

¹⁶⁴ 嘉慶《濬縣志》卷六，〈建置志〉引崇禎舊志，頁 2b-3a。按萬曆八年（1580）刊《濬縣志》卷二〈建置〉，頁 17b 載萬曆二年知縣楊鎔拓西城，「盡包浮丘山於城內」。然卷前〈縣城圖〉顯示，西南城橫互浮邱。後修志書均作「包浮邱山之半於城內」。其後城池未作大的改動，城隍廟一直在城外。

¹⁶⁵ 袁大猷，〈重修城隍廟記〉（萬曆間），乾隆《新蔡縣志》卷九，〈藝文〉，頁 44b。

¹⁶⁶ 道光《寧陝廳志》卷二，〈建置志〉，頁 8a, 1a。

¹⁶⁷ 光緒《佛坪廳志》卷首，〈廳城圖〉，頁 3a；卷一，〈建置志〉，頁 11a, 8a。

序號	地點	時段	基本情況
28	紫陽	嘉靖中至民國	紫陽縣設於正德六年，城池始建不詳，縣署與隍廟皆在外城。 ¹⁶⁸ 嘉靖三十五年縣署西移，重新築城。隍廟遂坐城外東北。 ¹⁶⁹
29	保安	順治間至民國	廟本在城內東北。崇禎亂後，截取城西南角為土城。遂坐城外。 ¹⁷⁰
30	宜君	雍正前至民國	雍正邑志：廟在北城外，沿革未詳，康熙五十四年重修。嘉靖省志載圖顯示，廟在城內西南。順治邑志則謂廟「在下城」。 ¹⁷¹ 縣城，景泰中始築未成，及成化中依山勢築削，為上下城，周圍五里三分。 ¹⁷²
31	浙江 臨安	南宋、元時期	咸淳《臨安志》載圖顯示，廟在城外東北。成化府志：廟舊在縣北一里，元末毀於兵，洪武三年建於縣治之東。按臨安城，咸淳《臨安志》載周回五百二十步。成化府志則稱「已圯」。 ¹⁷³
32	僊居	紹興二十一年 至至元中	廟舊在城內縣治東七十步，宋紹興二十一年徙東郭外。元至元丁丑毀於火，改建縣東五十步。 ¹⁷⁴
33	寧海	宋嘉定前後	廟始建於唐，嘉定《赤城志》載「在縣東南一百步」，縣境圖顯示，在城外東南。城池始建不詳，周回六百步。 ¹⁷⁵ 後不詳。嘉靖中新築，延袤一千五百餘丈。廟在城內東南。 ¹⁷⁶

¹⁶⁸ 龔輝，《全陝政要》（嘉靖二十一年序），卷三，〈漢中府〉，頁 21b；嘉靖《陝西通志》卷八，〈土地八·建置沿革〉，頁 18b。

¹⁶⁹ 康熙《紫陽縣新志》卷上，〈祠祀志〉，頁 38b；同書卷上，〈城郭志〉，頁 28a；民國《紫陽縣志》卷首，〈紫陽治城全圖〉，無頁碼；同書卷二，〈建置志〉，頁 1a-2a, 17b。按康熙邑志稱遷縣治前「無城垣」。

¹⁷⁰ 咸豐《保安縣志》卷二，〈城池〉，頁 4b；順治《保安縣志》卷前，〈縣治（圖）〉，無頁碼。

¹⁷¹ 雍正《宜君縣志》不分卷，〈祠祀〉，頁 28b；嘉靖《陝西通志》卷九，〈土地五〉，頁 19a；順治《宜君縣志》不分卷，〈城隍廟〉，無頁碼。

¹⁷² 雍正《宜君縣志》不分卷，〈城池〉，頁 2a。

¹⁷³ 咸淳《臨安志》卷一六，〈圖志·臨安縣境圖〉，頁 4a-b；同書卷一八，〈疆域·城郭〉，頁 6a；成化《杭州府志》卷三三，〈壇廟〉，頁 24b；同書卷一，〈封畛一·城隍〉，頁 25a。

¹⁷⁴ 嘉定《赤城志》卷三一，〈祠廟門〉，頁 18a；同書卷前，〈僊居縣治圖〉，頁 11a；光緒《僊居志》卷八，〈建置志下·壇廟〉，頁 2a。

¹⁷⁵ 嘉定《赤城志》卷三一，〈祠廟門〉，頁 21a；卷前，〈寧海縣境圖〉、〈寧海縣治圖〉，頁 12a-13b；卷二，〈地里門〉，頁 5a。

¹⁷⁶ 康熙《寧海縣志》卷一，〈輿地志·城郭〉，頁 18a-b；卷首，〈圖經·寧海縣治總圖〉，頁 4b。

序號	地點	時段	基本情況
34	義烏	明以前至嘉慶後	崇禎邑志：廟在縣北一百八十步，舊在縣南六十步，後徙於繡川門外三十步，洪武三年建於今所。 ¹⁷⁷ 義烏城，明以前無可考。舊設四門，南曰繡川。宋以來屢修。嘉靖間重建並增至七門，城隍廟在湖清門（西北門）外儒學右。 ¹⁷⁸
35	常山	正德七年至萬曆元年	光緒邑志：「城隍廟在縣治屏山東麓。萬曆縣志：宋乾道初知縣胡兢自縣南徙建北門外，久圯。明天順八年知縣杜英重建。萬曆元年知縣郝孔昭移置屏山東麓。」 ¹⁷⁹ 按：常山舊無城，正德七年始建，所謂乾道初徙建北門外，應指徙建之地在建城後為北門之外。 ¹⁸⁰
36	開化	正德中至民國	見前文。
37	瑞安	宋嘉祐前至洪武三年；永樂三年至民國	嘉靖邑志：廟在永豐廂白岩橋小嶼之巔。宋嘉祐間徙西南隅瀕江。元大德三年，復遷故址。明洪武初，遷縣東集真觀西址。永樂三年復遷故址。按：集真觀在城內東北隅，其西址更在城內無疑。 ¹⁸¹ 民國十二年重修。 ¹⁸²
38	慶元	嘉靖二十五年至光緒後	見前文。
39	宣平	嘉靖前至民國	見前文。
40	江西奉新	萬曆九年至同治後	見前文。
41	靖安	正德六年至嘉靖四十二年	廟始建未詳，洪武三年重建。縣城舊周二里，歲久圯廢。正德六年築土城，廟坐東城外。嘉靖四十二年更築磚城，圍入城內。 ¹⁸³

¹⁷⁷ 崇禎《義烏縣志》卷五，〈經制考上〉，頁 12a。

¹⁷⁸ 嘉慶《義烏縣志》卷一，〈建置〉，頁 7a-8a；同書卷首，〈圖考·縣志圖〉，頁 3a；萬曆《金華府志》卷前，〈義烏縣境之圖〉，無頁碼。

¹⁷⁹ 光緒《常山縣志》卷一六，〈建置志·祠廟〉，頁 1a-b。

¹⁸⁰ 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二四，〈祠祀〉，頁 12b 引《常山縣志》稱「洪武三年徙北城外」，未詳所據。

¹⁸¹ 嘉靖《瑞安縣志》卷五，〈祠祀志〉，頁 65b-66a；卷一〇，〈雜志·寺觀〉集真觀條，頁 90b：「（至正）甲辰築城，截其東北角於城外。洪武三年復割址三之一立城隍廟。後為道會司」；卷二，〈建置志〉，頁 46a，又載道會司「在東北隅集真觀內，洪武十五年建」。

¹⁸² 民國《瑞安縣志稿》不分卷，〈宗教門〉，頁 58a。

¹⁸³ 嘉靖《靖安縣志》刊於嘉靖四十四年，知縣趙公輔修、訓導吳館等纂。該志卷二，〈建置類〉，頁 20b 載廟在縣治東四百步許，「嘉靖四十二年知縣趙公輔起工營修，圍入東門內」；卷一，〈輿地類〉，頁 5a 吳館〈新建磚城記〉則言趙公輔修城後，不合規矩之處得以改正，其中包括「進城隍於內」（同治《靖安縣志》卷一三，〈藝文〉，頁 4a 收錄該文，作「建城隍祠於內」），可知城隍廟址未動。又可證之以下兩點：其一，嘉靖《靖安縣志》卷二，

序號	地點	時段	基本情況
42	鉛山	洪武初至同治後	鉛山舊無城，洪武元年始築城。廟在縣東東洋橋外，洪武三年重建。見前文。
43	廣昌	正德中或之前至同治後	廟舊在布政司右，洪武十三年徙建太平崗。 ¹⁸⁴ 廣昌舊土城，環五里。正德九年重築，較舊殺三之一，周七百六十一丈。 ¹⁸⁵ 隍廟此前是否在城內不詳，此後坐城外東北隅。
44	臨川	明初至康熙十八年	撫州府附郭縣。邑廟本在郡城西南隅，明初削去西南城，遂坐順化門外。康熙十八年遷城內。 ¹⁸⁶
45	吉安府	宋至民國	宋已建廟。 ¹⁸⁷ 元至正間蕭憲孫廟記：在郡城門外一里許。 ¹⁸⁸ 郡城自唐永淳間移今治。據乾隆郡志考證，晉咸康中至隋初，城在今治南一里。廟與城並建於晉，始在城中，徙治後，始坐城外。 ¹⁸⁹ 詳情待考。
46	吉安府永豐	弘治初至同治後	廟舊在縣治南二十步，洪武初改建城西儒學右。 ¹⁹⁰ 永豐舊有土城，久圯。弘治初因故址築城，嘉靖中擴東北隅，延袤九百餘丈。廟坐城外。 ¹⁹¹
47	龍泉	宋至民國	見前文。
48	信豐	洪武十七年至同治後	廟在城南民信門外，洪武十七年建。城池，宋嘉定間仍舊基修築。洪武中仍舊加修。 ¹⁹²

〈建置類〉，頁 19b-20a 載懷功祠「在城隍廟右」，歲久祠廢。卷前城池圖亦顯示，祠在城隍廟東，兩者僅一牆之隔。後修邑志所述悉同。其二，嘉靖四年刊《江西通志》卷四，〈南昌府·祠廟〉，頁 64a 載靖安縣城隍廟「在縣治東四百步」。其後歷修各級志書所載悉同。據此可以認為，趙公輔修城時，城牆從城隍廟與懷功祠中間穿過，城隍廟被圈入城內。以是知康熙諸志所稱「遷入東門內」為不確。見康熙《靖安縣志》卷二，〈輿地志·壇廟〉，頁 27b。

¹⁸⁴ 康熙《廣昌縣志》卷四，〈祀典〉，頁 112b。據卷首〈邑治圖〉，布政司在城南，則邑廟舊址當在城內。無頁碼。

¹⁸⁵ 康熙《廣昌縣志》卷一，〈城池志〉，頁 32a-33b。按：該志記述截去的部分為，「自龍岡之麓直環學宮，接原址，殺昔三之一」。龍岡在縣治西北，學宮在縣治東。則被截去者實為東北一隅。

¹⁸⁶ 同治《臨川縣志》卷一五，〈建置·壇廟〉，頁 10b。

¹⁸⁷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禮二〇之一八〉，第 1 冊，總頁 773 下。

¹⁸⁸ 光緒《吉安府志》卷八，〈建置志〉，頁 10b。

¹⁸⁹ 乾隆《吉安府志》卷一一，〈建置志〉，頁 2b-4a；民國《廬陵縣志》卷三，〈疆域〉，頁 3b。

¹⁹⁰ 嘉靖《吉安府志》卷六，〈輿地志〉，總頁 544 上，566 下。

¹⁹¹ 同治《永豐縣志》卷七，〈建置志〉，頁 1a-2a；卷前，〈永豐縣治圖〉，頁 5a。

¹⁹² 嘉靖《江西通志》卷三四，〈贛州府〉，頁 55b；康熙五十八年刊《信豐縣志》卷四，〈祠祀志〉，頁 4a；同書卷二，〈建置志〉，頁 1a-2b。

序號	地點	時段	基本情況
49	興國	明初至乾隆三年	明以前廟址不詳，明初建於城北儒學左。乾隆三年，遷城內大乘寺左。見前文。
50	南安府	至正十二年至嘉靖四十年	宋已建，本在城內。元時大水壞城，廟坐河南。至正十二年於河北築城，始成外廟。嘉靖四十年，築水南城，圍城隍廟於內。 ¹⁹³
51	南康	弘治間至同治後	嘉靖邑志：廟在城外東北。舊在縣西二十步許，洪武初遷於縣東百步許，成化間遷今所。邑城，宋紹定中重修，元末隳廢。弘治中重築，廣袤五千八百餘丈。 ¹⁹⁴
52	上猶	弘治四年至康熙四年	南唐保大間置縣。宋紹定中始築城。城隍廟，明以前沿革不詳。弘治四年由城內西南隅改建北門外，康熙四年改遷城內縣治東。 ¹⁹⁵
53	崇義	正德十四年至嘉靖二年	正德間立縣，十二年始築城。廟建於正德十四年，舊在縣北獨秀峰下，嘉靖二年遷城內。見前文。
54	湖北崇陽	萬曆間至雍正七年	廟建於洪武初，舊在西門外，雍正七年徙城內。舊廟改稱祖師廟。崇陽城，明初惟土城，萬曆間重築，歷有修葺。周一千三百餘步。 ¹⁹⁶
55	興國州	嘉靖之前至民國	廟在朝天門外富川門之右，始建不詳，嘉靖中重修。興國舊無城，宋立六門，東為富川。洪武初，修小城，周數里。設五門，東曰朝天，格局相沿不改。 ¹⁹⁷
56	麻城	洪武初至萬曆初	廟建自洪武初，弘治府志載圖顯示在南城外，康熙邑志載圖則顯示，廟在城內南部。相沿未改。麻城舊有土城，後傾圮，弘治間甃以石，城周不詳。萬曆元年擴建城池，周九百五十八丈。 ¹⁹⁸ 城隍廟當在此時被圍入城內。
57	宣城	成化元年前至嘉靖三十年	城隍廟，元時立，洪武間重修。宣城縣，唐時築土城。後不詳。成化元年因賊亂，築土城，周三里許。嘉靖省志載圖顯示，廟在城外西北。嘉靖三十年拓城，跨西岡，圍廟入城。 ¹⁹⁹

¹⁹³ 康熙《南安府志》卷四，〈建置志上〉，頁 2b-3a。

¹⁹⁴ 嘉靖《南康縣志》卷四，〈廟祠〉，頁 9a；卷前，〈南康縣境圖〉，無頁碼；卷三，〈城池〉，頁 17a-b。

¹⁹⁵ 康熙《上猶縣志》卷三，〈建置志〉，頁 12b。

¹⁹⁶ 乾隆《崇陽縣志》卷二，〈建置志·廟祠〉，頁 85a-b, 68b-69a；同治《崇陽縣志》卷二，〈建置志·壇廟〉，頁 28b-30b, 1a-b。

¹⁹⁷ 光緒《興國州志》卷一〇，〈祀典志〉，頁 2a；同書卷六，〈政典志〉，頁 1a-b；嘉靖《興國州志》卷四，〈兵防〉，頁 25a。

¹⁹⁸ 弘治《黃州府志》卷前，〈麻城縣圖〉，無頁碼；同書卷一，〈地理·城池〉，頁 19a；康熙《麻城縣志》卷前，〈麻城縣圖·縣城圖〉，頁 3a；同書卷二，〈城社志〉，頁 1a-b。

¹⁹⁹ 嘉靖《宣城縣志》卷中，〈祠廟〉，頁 38a；同治《宣城縣志》卷二，〈建置志〉，頁 1a-2b。

序號	地點	時段	基本情況
58	鄖西	成化十四年至嘉慶二年	廟建於成化十四年，嘉靖省志載圖顯示在城外東南。縣城，成化十二年創築，周回八百餘步。 ²⁰⁰ 崇禎末年城毀，嘉慶二年重築，較舊城往東、南方向擴展。 ²⁰¹ 疑城隍廟在此時圍入城內。
59	上津	成化至嘉靖二年前後	嘉靖元年刊省志載廟在北城外。 ²⁰² 萬曆六年刊府志則載在「縣北關南北（按：疑有衍字）」。 ²⁰³ 萬曆二十一年重修記云「津陽舊有城隍廟在治北隅，歷百有餘歲」。 ²⁰⁴ 具體位置不能確定。同治邑志載圖顯示，廟在城中。 ²⁰⁵ 按：上津舊無城，成化四年創築土城，周回四百七十丈，歲久傾圮，惟北門尚存。嘉靖二年築磚城，延袤二千五百餘步。崇禎末城毀，順治初沿舊址三之一重建。順治十六年降縣為堡，乾隆時雉堞已毀，門制猶在。嘉慶六年重建城垣。 ²⁰⁶ 則邑廟似於嘉靖初圍入城內。
60	遠安	順治間至康熙五年	崇禎間遷治鳳山，順治初築城，廟在城外北。康熙五年遷治東莊坪。 ²⁰⁷
61	湖南新寧	景泰二年至正德十一年	廟建於成化以前，舊在永安門外，正德十一年改遷城內縣治東。新寧舊無城，景泰二年徙治於縣東二里，築土城，成化中始甃石。 ²⁰⁸
62	巴陵	康熙五年至光緒後	見前文。

14a；同書卷九，〈藝文上〉，錄郭銜〈拓城記〉，頁 41a-42a；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八前，〈宜城縣圖〉，無頁碼。

²⁰⁰ 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九，〈鄖陽府〉，頁 14b, 26b；卷九前，〈鄖西縣圖〉，無頁碼。

²⁰¹ 有關嘉慶二年鄖西城址的變動，魯西奇已有考察，參氏著，《城牆內外》，頁 391-392。

²⁰² 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九，〈鄖陽府〉，頁 26b；卷九前，〈鄖西縣圖〉，無頁碼。

²⁰³ 萬曆《鄖陽府志》卷一六，〈祀典〉，頁 3a。

²⁰⁴ 熊軒，〈重修城隍廟記〉，嘉慶《鄖陽志》卷三，〈祠祀〉，頁 21a。

²⁰⁵ 同治《鄖西縣志》卷首，〈圖·上津城署〉，頁 12b-13a。

²⁰⁶ 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九，〈鄖陽府·城池〉，頁 14a-b；萬曆《鄖陽府志》卷五，〈城池〉，頁 6a；乾隆《鄖西縣志》卷一九，〈藝文〉錄嘉靖三年梁樾〈上津縣磚城記〉，頁 16b-17a；同書卷三，〈城池〉，頁 2a-b。有關上津縣城沿革，亦見魯西奇，《城牆內外》，頁 392-394。

²⁰⁷ 順治《遠安縣志》卷四，〈祀典志〉，頁 2a；同治《遠安縣志》卷一，〈輿地志〉，頁 5b；同書卷五，〈寺觀〉，頁 3a。

²⁰⁸ 萬曆《新寧縣志》卷四，〈地理考·祀典志〉，頁 9b；卷三，〈地理考·形勝志〉，1b-2a。

序號	地點	時段	基本情況
63	安鄉	嘉靖中至民國	廟建於洪武二年，在縣治南。安鄉舊有城，在城南一里，宋建炎中建，紹興中遷治城北，以地隘未建城，嘉靖中於市四嚮道所在甃磚，創東西南北四門。廟坐南門外。後建築城垣。格局未改。 ²⁰⁹
64	慈利	萬曆初至清初；康熙十二年至民國	邑治屢遷，洪武九年遷至隆慶三年、萬曆六年至清初、康熙十二年後，皆在今治。初無城，成化、正德間樹柵立門。萬曆間，城周一千二百四十丈，明末城圯，乾隆中縮築，周圍六百三十九丈餘。 ²¹⁰ 弘治、隆慶郡志均載宣德八年建廟，在「縣西」。 ²¹¹ 康熙二十四年所修邑志則載廟在「縣西城外」。 ²¹² 未言建置年代，頗疑即宣德間所建者。
65	衡山	正統十年至隆慶二年；萬曆十七年至光緒以後	康熙間，蕭士熙〈重修城隍祠記〉：祠舊在南城外，隆慶二年移於城內，萬曆十七年遷於故地。 ²¹³ 衡山舊無城，正統十年立六門、更樓以戒不虞。成化十八年頽圯，知縣劉熙重建。 ²¹⁴
66	桂陽州	洪武初至同治以後	廟建於洪武二年，嘉靖間志書已載其在南門外。州城，洪武初仍舊基修建，成化四年甃以石，周五百二十八丈。 ²¹⁵
67	郴州	至元間至嘉慶後	萬曆州志：元至元間肇建城隍廟於城南門外。城池始建於漢，歷有修築，洪武元年展築，嘉靖中於城北築外城。 ²¹⁶ 其後相沿未改。 ²¹⁷
68	永興	天順元年至光緒後	廟在城外化龍橋東，洪武初建。舊無城，明天順元年築土垣。 ²¹⁸

²⁰⁹ 隆慶《岳州府志》卷六，〈軍政考〉，頁 24b-25a；同書卷九，〈秩祀考〉，頁 42b；康熙《安鄉縣志》卷二，〈封域志上〉，頁 7a。按：隆慶《岳州府志》卷一，〈圖說·安鄉縣圖〉，頁 9b-10a 標註安鄉縣城隍廟在城東門內，疑誤。

²¹⁰ 嘉慶《重修慈利縣志》卷二，〈城池〉，頁 54a-56a。

²¹¹ 弘治《岳州府志》卷一〇，〈慈利縣·壇壝志〉，頁 15b；隆慶《岳州府志》卷九，〈秩祀考〉，頁 44a；同書卷一，〈圖說·慈利縣圖〉，頁 12b。

²¹² 康熙《岳州府慈利縣志》卷二，〈祠祀〉，頁 10a。

²¹³ 光緒《衡山縣志》卷一九，〈壇廟〉，頁 24a。

²¹⁴ 弘治《衡山縣志》卷一，〈城池〉，頁 14a。

²¹⁵ 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一二前，〈桂陽州圖〉，無頁碼；嘉靖《衡州府志》卷四，〈祀典祠宇〉，頁 20b；同書卷三，〈城池〉，頁 2a。

²¹⁶ 萬曆《郴州志》卷一二，〈秩祀志〉，頁 2a；卷八，〈創設志上·城池〉，頁 1a-b。

²¹⁷ 嘉慶《郴州總志》卷一，〈封域志·郴州之圖〉，頁 5a；卷一三，〈祀禮志〉，頁 13a；卷八，〈城池志〉，頁 1b-2a。

²¹⁸ 光緒《永興縣志》卷一七，〈祠廟〉，頁 9b；卷一〇，〈城池志〉，頁 1a。

序號	地點	時段	基本情況
69	桂陽 (汝城)	弘治八年前	桂陽縣，宋嘉定中始築城，周圍一百六十步。明成化元年展築，周二里許。弘治八年向東、南二方展築，周七百九十八丈。 ²¹⁹ 廟始建未詳，嘉靖省志載「在縣南城外半里許」，其〈桂陽縣境圖〉不甚清晰，廟址不詳，縣署則在南門內。 ²²⁰ 乾隆邑志所錄嘉靖間邑志城池圖，則顯示廟在南門內之西、縣署之南。 ²²¹ 這就說明，嘉靖省志沿襲成化二十年舊志，嘉靖初年續補時未之改。亦即，成化元年展築城池，廟可能尚在城外，至弘治八年拓展城址，才被圈入城內。
70	桂東	成化、嘉靖間 至民國	嘉靖省志：桂東舊無城，成化間築土城，正德間甃以磚，城周二百五十丈。又載廟在縣南三十步，洪武元年建。載圖顯示，廟在城內西南隅。 ²²² 隆慶以前已坐於西城外。原因不詳。 ²²³ 其後相沿未改。 ²²⁴
71	靖州	洪武以前至嘉 慶二十年	始建未詳。洪武州志：「城隍廟在城外南」，又載「舊在城內西南」。 ²²⁵ 嘉慶二十年，遷建城東門內花崗。 ²²⁶
72	會同	洪武前至成化 四年	洪武《靖州志》載在城外西。康熙邑志：廟舊在城外，成化四年縣令遷入城內東南隅。 ²²⁷

²¹⁹ 乾隆《桂陽縣志》卷三，〈建置志〉，頁 1a-2a。

²²⁰ 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一四，〈郴州·祠廟〉，頁 26b；〈郴州·桂陽縣境圖〉，無頁碼。

²²¹ 乾隆《桂陽縣志》卷一，〈圖像志·舊志縣城圖〉，頁 7b。按：同治《桂陽縣志》卷三，〈輿圖〉亦載此圖。圖中文字稱「此乃舊志所存先朝縣城圖」。所謂「舊志」，指嘉靖間邑人曹瑀創修，教諭翁繼榮（嘉靖七年〔1528〕任）、朱經濟（嘉靖三十四年任）陸續撰修者。

²²² 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一四，〈郴州〉，頁 14a, 26b；同卷前，〈桂東縣境圖〉，無頁碼。

²²³ 萬曆《郴州志》卷一二，〈秩祀志〉，頁 14a，謂「城隍廟在縣城外西邊，正德間鄉官羅文等修。隆慶間知縣王敬賓重修並記：……桂東城隍祠在西門外，嘉靖改元時，吾鄉周徵庵氏所建，歲久漸圯」。據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一四，〈郴州文類〉，頁 59a，謝□〈重修（桂東）城隍廟記〉：明初，廟在西廓連珠山下，「更歷彌久」。丁丑年（當為正德十三年〔1518〕）省祭官羅君（當為羅文）倡捐重修。則似乎城隍廟自明初未遷址。桂東城自正德間磚砌後，未有大的變動。

²²⁴ 康熙二十四年（1685）修、康熙五十八年續修《郴州總志》所繪〈桂東縣圖〉，均將城隍廟置於城內。該圖極簡略，僅標注縣署與城隍廟，未詳所自。按康熙十二年、乾隆二十四年所修縣志，均於縣境圖中將城隍廟標在城外西南。

²²⁵ 洪武《靖州志》不分卷，〈總類〉，無頁碼。版本題名據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補編》。按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一九，〈靖州·祠祀〉，頁 17b，載廟「在州南，正統間知州蘇恣重建」。該卷前所載〈靖州圖〉則顯示，廟在城內。疑有誤。

²²⁶ 光緒《靖州直隸州志》卷三，〈祠祀〉，頁 3a。

²²⁷ 洪武《靖州志》不分卷，〈總類〉，無頁碼；康熙《會同縣志》卷五，〈禮制志〉，頁 7b。

序號	地點	時段	基本情況
73	通道	約康熙間至光緒後	廟舊在城內西南方，約在康熙年間，坐於城外。 ²²⁸ 原因不詳。光緒年間的志書顯示還在城外。 ²²⁹
74	永綏	乾隆二十三年前；嘉慶八年至宣統後	永綏廳設於雍正八年，初治吉多坪，九年築土城，周圍三里三分。城隍廟始建未詳，初在城外，乾隆二十三年移建西城內。嘉慶七年移治花園，次年建廟於「東關內大街」。 ²³⁰ 據宣統廳志城圖，廟在東門外。 ²³¹
75	福建長樂	洪武十四年至正德七年	崇禎邑志：廟舊在縣治後東北五十步，洪武十四年改創於東隅城外半里許。正德七年以城外所建祀朱文公，仍祀城隍於舊廟。 ²³²
76	閩清	順治十七年至民國	舊在西門內，順治十七年建置城垣，廟隔城外。見前文。直至民國。 ²³³
77	壽寧	弘治中至乾隆後	廟創於景泰七年。嘉靖中重修，記謂「舊設在城西外，去縣治一里許」。康熙邑志及乾隆郡志均載在西城外。 ²³⁴ 壽寧城始建於弘治十八年，延袤七百七十丈。嘉靖中再修。 ²³⁵ 則建城之始，廟即在城外。
78	延平府	洪武二年至嘉靖二十八年	舊在北隅開平坊譙樓前，洪武二年遷府城外南隅縣學右。嘉靖二十八年移建紫芝嶺上。 ²³⁶
79	政和	弘治元年至民國	見前文。
80	臺灣鳳山	康熙六十一年至乾隆五十三年	城隍廟建於康熙五十七年，六十一年始築土城。周八百一十丈。 ²³⁷ 乾隆五十三年遷治陂頭。

²²⁸ 洪武《靖州志》，〈通道縣境之圖〉，無頁碼；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一九，〈靖州·祠廟〉，頁 17b；同書卷一九前，〈通道縣圖〉，無頁碼；康熙《通道縣志》卷上，〈輿圖〉，頁 1b-2a。

²²⁹ 光緒《靖州直隸州志》卷首，〈輿圖·通道縣圖〉，頁 6a。

²³⁰ 乾隆《辰州府志》卷一八，〈壇廟考〉，頁 32b；同治《永綏直隸廳志》卷二，〈營建門〉，頁 14a。

²³¹ 宣統《永綏廳志》卷三，〈輿圖〉，無頁碼。

²³² 崇禎《長樂縣志》卷五，〈祀典志〉，頁 14a。

²³³ 民國《閩清縣志》卷二，〈建築志〉，頁 4a。

²³⁴ 康熙《壽寧縣志》卷七，〈藝文志〉，錄嘉靖間梁可大〈城隍廟記〉，頁 11b；同書卷前，〈縣城圖〉，無頁碼；乾隆《福寧府志》卷三四，〈雜誌·壇廟〉，頁 26b。

²³⁵ 康熙《壽寧縣志》卷二，〈建置志〉，頁 1b-2a。

²³⁶ 弘治《八閩通志》卷六〇，〈祠廟〉，下冊，頁 400；道光《福建通志》卷二四，〈壇廟〉，頁 1b。

²³⁷ 乾隆《重修鳳山縣志》卷二，〈規制志·城池〉，總頁 29。

序號	地點	時段	基本情況
81	廣東樂昌	嘉靖十八年至二十六年	城隍廟，洪武二年建於北門內，正德十三年徙於縣西南。嘉靖十八年徙於城北門外，二十六年復遷北門內故地。縣城，洪武二年遷治城南都，始築土城，後相沿未改。 ²³⁸
82	乳源	洪武六年至同治後	洪武元年遷治，築土城。廟在東門外，洪武六年建。
83	英德	天順初以前至嘉慶十九年	道光邑志：城隍廟，宋時在英德府北一里，洪武二年改建城南一里許，乾隆中移建左近學宮址，嘉慶十九年再移西門內。按康熙邑志，廟在縣治西風雲街右。此地與舊學宮皆在城外。又按：縣城即潯陽縣故城，明初僅存八十餘丈，天順五年重修，周圍一里有奇三百八十八丈。 ²³⁹ 則至少自天順初修城，廟即在城外。
84	陽山	天順七年至民國	見前文。
85	連山	成化、嘉靖間至民國	天順二年，連山遷治象山前小水坪，成化四年築城，周一百八十丈。 ²⁴⁰ 廟始建未詳，嘉靖省志載在縣東山川壇旁。康熙邑志載圖顯示，廟在城外東北。後相沿未改。 ²⁴¹
86	和平	嘉靖二年至三十七年	嘉靖二年建廟，初在城外西南一里，康熙邑志始載在西南門內。縣城建於正德十四年，周四百五十丈，嘉靖三十七年拓城四百餘丈。 ²⁴² 因廟址相沿未改，疑拓城時圈廟入城。 ²⁴³
87	饒平	成化間至弘治六年	成化十四年置縣並建城。城周七百二十一丈。城隍廟建於設縣之初，舊在北城外，弘治六年移置於城西。 ²⁴⁴

²³⁸ 民國《樂昌縣志》卷二〇，〈古跡〉，頁 3a；卷七，〈建置〉，頁 1a-b。

²³⁹ 道光《英德縣志》卷六，〈建置略下〉，頁 6b-8b；同書卷五，〈建置略上〉，頁 1a；康熙《英德縣志》卷一，〈地輿志·縣境圖〉，頁 1b-2a；同書卷三，〈秩祀志〉，頁 39a。

²⁴⁰ 民國《連山縣志》卷三，〈建置志·城治〉，頁 1a-b。

²⁴¹ 嘉靖《廣東通志》卷三〇，〈政事〉，頁 725；康熙《連山縣志》卷首，〈縣城圖〉，無頁碼；民國《連山縣志》卷三，〈建置志·壇廟〉，頁 8b。

²⁴² 嘉靖三十五年刊《惠州府志》卷九，〈祀典志〉，頁 4a；同書卷六，〈建置志〉，頁 24a；康熙《和平縣志》卷七，〈兵防志〉，總頁 114；同書卷八，〈秩祀志〉，總頁 128。

²⁴³ 城隍廟側有社學，嘉靖三十五年刊《惠州府志》卷八，〈學校〉，頁 16b 記為：「在西門外城隍廟側，嘉靖二年知縣劉琰建。」乾隆《和平縣志》卷二，〈建置志〉，頁 17a 則載為「在城內城隍廟側，嘉靖二年知縣劉琰建，今廢」，可證城隍廟在位置上沒有變動。又據民國《和平縣志》卷首，〈圖像·和平縣城全圖〉（1942 年測繪），城隍廟緊逼城垣（無頁碼）。

²⁴⁴ 嘉靖《潮州府志》卷四，〈祠祀志〉，頁 15b；順治《潮州府志》卷一二，〈古今文章部〉中帙，收嘉靖間羅胤凱〈饒平城隍廟記〉，頁 39a。

序號	地點	時段	基本情況
88	文昌	嘉靖間至康熙二十六年	康熙邑志：廟舊在城內縣治之南，嘉靖間移鎮田山下，萬曆間移建北門外橋頭，康熙二十六年遷建於城內舊址。後相沿不改。按同書載鎮田山「在縣治之左」，查縣境圖，城東門外有小山， ²⁴⁵ 疑即此。
89	陵水	正德前至萬曆十年	正統五年遷南山所城。正德《瓊臺志》已載廟在城北。萬曆十年遷城內。
90	廣西永福	天順、正德間至民國	唐武德中始立縣，舊無城，天順六年始築土城，弘治九年復築，周三里餘。 ²⁴⁶ 城隍廟，唐已有之，沿革未詳。嘉靖省志、康熙郡志載「在縣西」，雍正省志則記為「在縣西城外」。 ²⁴⁷ 該廟康熙間重建，嘉慶三年重修，記謂「邑舊有廟在西關外，創自明正德間」。 ²⁴⁸ 或有所據。其所謂「創」者，可能為原地重建或異地遷建。
91	灌陽	洪武二十八年至正德末	康熙邑志：城隍廟在縣治西，舊在縣北城外，明正德間知縣王志移建此。縣舊無城，洪武二十八年始築土城，周四百七十丈。 ²⁴⁹
92	賓州	萬曆前至民國	城隍廟始建無考，萬曆州志：在「城南」。雍正省志則載「在南門外南街」。直至民國間。 ²⁵⁰ 治城，宋開寶中遷築，明初復修，正德間砌以磚，周五百七十七丈。 ²⁵¹
93	西林	康熙六年後	康熙六年始築土城，周二百八十五丈。廟在城外北，康熙六年建。 ²⁵²
94	荔浦	景泰七年至民國	景泰七年，荔浦徙治，廟在城外東南。相沿未改。邑城，成化中周回二百四十八丈，光緒中周一里三分。 ²⁵³

²⁴⁵ 康熙《文昌縣志》卷二，〈建置志〉，頁44；卷一，〈疆域志〉，頁16, 26。

²⁴⁶ 嘉靖《廣西通志》卷三二，〈兵防志·城池〉，頁5a。按民國《永福縣志》卷一，〈建置·城池〉，頁36b載「明永樂間知縣鄭曦始築圍垣」，所據不詳。

²⁴⁷ 嘉靖《廣西通志》卷三三，〈壇廟志上〉，頁15a；康熙《桂林府志》不分卷，〈壇廟志上〉，無頁碼；雍正《廣西通志》卷四二，〈壇廟〉，頁11b。

²⁴⁸ 民國《永福縣志》卷一，〈建置·壇廟〉，頁44a；卷四，〈藝文〉，錄張世浣〈重修城隍廟記〉，頁41a-b。

²⁴⁹ 康熙《灌陽縣志》卷二，〈建置志〉，頁6a, 1a。

²⁵⁰ 萬曆《賓州志》卷三，〈建置志〉，總頁24上；雍正《廣西通志》卷四二，〈壇廟〉，頁83a；民國《賓陽縣志》第八編，頁728。

²⁵¹ 光緒《賓州志》卷五，〈城池〉，頁1-3。

²⁵² 康熙《西林縣志》不分卷，〈城池〉，頁7b；同書，〈祀典〉，頁13b；嘉慶《廣西通志》卷一四四，〈建置略·壇廟四〉，頁2a。

²⁵³ 嘉靖《廣西通志》卷三四，〈壇廟志〉，頁8a；康熙《荔浦縣志》卷二，〈城池〉，頁5a；民國《荔浦縣志》，〈建置類〉，頁50, 53。

序號	地點	時段	基本情況
95	梧州府	約明初至嘉靖元年	《永樂大典》引《蒼梧志》：廟在州城外東南隅。 ²⁵⁴ 嘉靖省志：廟舊在城東一里，嘉靖初改建城西門內。 ²⁵⁵ 梧州城，宋至和中展築，周二百五十七丈；洪武十二年復展，周八百六十丈。 ²⁵⁶
96	岑溪	明初；成化十年至正德十五年	縣城，洪武三年建。《永樂大典》引《古藤志》：城周一百九十丈。又記城隍廟在社壇西，社稷壇在縣北。〈岑溪縣境圖〉顯示，廟在城外西。 ²⁵⁷ 按乾隆邑志，成化十年，邑城遷西北五里，磚城周一百六十丈，正德十五年，築土城於外，周三百八十餘丈。又記城隍廟在城西，與縣治同立，嘉靖三十七年重建。又記學宮，正德十六年遷外城城隍廟西。則知廟在磚城之外。 ²⁵⁸
97	鬱林	明初	《永樂大典》引《鬱林志》：廟在州城之南；〈鬱林州郡境圖〉顯示，廟在城外。 ²⁵⁹ 反映的是明初的情形。自雍正省志已載其在南門內，後相沿未改。 ²⁶⁰ 詳情不可考。元至正間所築城垣，周圍二百六十丈餘（一說二里八十步），洪武十九年創築新城，周六百四十丈。 ²⁶¹
98	博白	明初以前至道光後	在東城外。見前文。

²⁵⁴ 馬蓉等，《永樂大典方志輯佚》，頁 2896。按：張國淦《永樂大典方志輯本》頁 1446-1447 考訂，《蒼梧志》當是明初據宋薛成之《蒼梧志》增補，仍沿舊稱。

²⁵⁵ 嘉靖《廣西通志》卷三四，〈壇廟志〉，頁 8a-b。

²⁵⁶ 馬蓉等，《永樂大典方志輯佚》，引《蒼梧志》，頁 2885；嘉靖《廣西通志》卷三二，〈兵防志·城池〉，頁 17b。

²⁵⁷ 馬蓉等，《永樂大典方志輯佚》，頁 2980, 2993, 2995。按《古藤志》，張國淦《永樂大典方志輯本》頁 1478 考為「明初據宋增補」。

²⁵⁸ 乾隆《岑溪縣志》，〈營繕志〉，頁 86；〈藝文志〉收萬曆二十七年（1599）曾莘〈拓建新城記〉，頁 158-159；〈祀典志〉，頁 92；〈學校志〉，頁 95。按：嘉靖《廣西通志》卷三四，〈壇廟志〉，頁 11b 稱廟在「城北二里」，或為因襲舊志。

²⁵⁹ 馬蓉等，《永樂大典方志輯佚》，頁 3061, 3363。

²⁶⁰ 雍正《廣西通志》卷四二，〈壇廟〉，頁 90a。按：嘉靖《廣西通志》卷三四，〈壇廟〉，頁 12a 記鬱林城隍廟「在州治東」，未詳所自。

²⁶¹ 馬蓉等，《永樂大典方志輯佚》，頁 3047 引《鬱林志》；乾隆《鬱林州志》卷三，〈建置〉，頁 5a。

序號	地點	時段	基本情況
99	北流	洪武間至成化七年	洪武三十一年，邑治遷寶圭驛東。舊有土城，久毀。景泰元年、成化三年相繼修築。成化七年，以「地狹城隘」，移西南一里儒學地改築為城。周圍三百三十餘丈。 ²⁶² 嘉慶省志：廟在「城東北隅」，洪武間建，成化間遷城，移於此地。 ²⁶³ 據《永樂大典》載圖，廟在南城外。儒學則在其西。 ²⁶⁴ 為成化七年遷城前的情形。
100	陸川	洪武初至天順間	廟舊在縣東，洪武初遷南門外，天順間遷縣治北。縣城舊為土垣，永樂間始築土城。成化間重修，周二百六十丈。 ²⁶⁵
101	興業	洪武初至乾隆四十四年	嘉慶邑志：廟建於洪武初，舊在北門外，康熙五十六年改建東門之東，乾隆十六年遷南門外縣墟之西，乾隆四十四年遷建城內西北隅。 ²⁶⁶ 據《永樂大典》載圖，廟在城外西北。 ²⁶⁷ 崇禎府志附圖亦顯示，廟在城外東北。 ²⁶⁸ 治城，舊樹木為城，洪武初築土城，周圍二百一十餘丈，宣德五年增築，周一百六十三丈。歷有修葺，悉如宣德初制。 ²⁶⁹
102	潯州	弘治後、嘉靖前至雍正前	嘉靖省志：廟在府治東，洪武間建，弘治間重建。同治府志則載：廟舊在「小南門」，有嘉靖二十一年、萬曆四十一年碑記，後遷入城中榕木社右，乾隆三年知縣集議遷建大街。 ²⁷⁰ 按：府治在城西北隅，建於洪武八年，相沿不改。則隍廟應在弘治後至嘉靖前某時遷小南門外。再遷城內榕木社時間不詳，雍正省志已載廟在城內。 ²⁷¹ 又按：洪武六年廣舊城。不久展築，周一千三百餘丈。 ²⁷²
103	平南	天順前至弘治中；清初至光緒後	見前文。

²⁶² 光緒《北流縣志》卷三，〈建置〉，頁 1a-b；卷一一，〈古跡〉，頁 2a。

²⁶³ 嘉慶《廣西通志》卷一四六，〈建置略·壇廟六〉，頁 20b。

²⁶⁴ 見馬蓉等，《永樂大典方志輯佚》，頁 3365 所錄〈北流縣圖〉。

²⁶⁵ 民國《陸川縣志》卷五，〈建置類〉，頁 13b, 1a。

²⁶⁶ 嘉慶《續修興業縣志》卷二，〈建置〉，頁 6a-b。

²⁶⁷ 馬蓉等，《永樂大典方志輯佚》，頁 3369 所錄〈興業縣境圖〉；頁 3061 引《鬱林志》：「（興業縣）城隍廟在縣城之東北。」

²⁶⁸ 崇禎《梧州府志》卷首，無頁碼。

²⁶⁹ 嘉慶《續修興業縣志》卷二，〈建置〉，頁 1a-b；馬蓉等，《永樂大典方志輯佚》，頁 3048 引《鬱林志》。

²⁷⁰ 嘉靖《廣西通志》卷三四，〈壇廟下〉，頁 14b；同治《潯州府志》卷七，〈祠祀〉，頁 2a。

²⁷¹ 雍正《廣西通志》卷四二，〈壇廟〉，頁 38a。

²⁷² 嘉靖《廣西通志》卷三二，〈兵防志·城池〉，頁 23b。

序號	地點	時段	基本情況
104	橫州	明初以前至道光後	《永樂大典》載圖：廟在城外東。 ²⁷³ 嘉靖間郡志亦載，廟在東城外，成化間重修。乾隆州志等載廟在南門外，據州城圖，在東南角城外。 ²⁷⁴ 橫州舊有城，明初復修，周回三百二十五丈。 ²⁷⁵ 後屢有興築，嘉慶間周六百十丈。 ²⁷⁶
105	太平府	洪武五年至六年	洪武三年遷治，五年建城，周六百四十二丈。廟先在東城外。洪武六年水泛，遷於城內。 ²⁷⁷
106	上石西州	萬曆二十三年至崇禎間	廟在南城外，萬曆二十三年建。嘉慶間尚存。城建於萬曆十九年。周圍不詳。 ²⁷⁸
107	上思	正德間至嘉靖三十二年；嘉靖後期至乾隆末	廟舊在城內，正德中遷東郭外，嘉靖三十二年復遷城中，不久遷建城外。乾隆末年遷城內震方。 ²⁷⁹ 上思城，弘治中遷江北築新城，嘉靖中展築，周五百三十八丈。康熙中復修，周四百三十八丈。 ²⁸⁰

²⁷³ 見馬蓉等，《永樂大典方志輯佚》，頁 3350 所錄〈橫州之圖〉。

²⁷⁴ 嘉靖十七年刊《南寧府志》卷五，〈祠廟〉，總頁 142；乾隆《橫州志》卷八，〈秩祀志〉，頁 8a；同書卷一，〈方域圖〉，頁 3b。

²⁷⁵ 馬蓉等，《永樂大典方志輯佚》，頁 2943 引《南寧府志》。按《南寧府志》，張國淦《永樂大典方志輯本》考為洪武八年以後所修，頁 1513。

²⁷⁶ 嘉慶《廣西通志》卷一二八，〈建置略·城池三〉，頁 8b-10b。

²⁷⁷ 萬曆《太平府志》卷一，〈沿革〉，總頁 168 下；〈壇廟〉，總頁 195 上；〈城池〉，總頁 174 上。

²⁷⁸ 楊芳等，《殿粵要纂》卷四，〈上石西州圖〉，頁 15 前；雍正《廣西通志》卷四二，〈壇廟〉，頁 62a；同書卷六一，〈土司〉，頁 23b-24a。按：上石西州事，崇禎間併歸本府通判管理，雍正間改隸明江同知，皆駐他城。

²⁷⁹ 嘉靖四十三年刊《南寧府志》卷五，〈祀典志〉，頁 8b；康熙《南寧府全志》不分卷，〈寺觀志〉，無頁碼；民國《上思縣志》卷五，〈建置〉，頁 40a-b。

²⁸⁰ 道光《上思州志》卷五，〈建置志〉，頁 1b-2a。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1-1966。簡稱《天一閣》。
- 《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簡稱《天一閣續編》。
- 《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簡稱《日本藏》。
- 《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續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簡稱《日本藏續編》。
-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簡稱《北圖珍本》。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4-1997。簡稱《四庫存目》。
- 《清德宗實錄》五九七卷，北京：中華書局，1987，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本影印。
-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簡稱《四庫全書》。
- 《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北京：中國書店，1992。簡稱《稀見方志》。
- 《諸司職掌》十卷，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 74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國家圖書館藏明刻本影印。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摺（第 27 輯）》，北京：中華書局，1995。
- 王昶，《金石萃編》一六〇卷，嘉慶經訓堂刊本。
- 佟世思，《耳書》一卷，康熙四十年（1701）佟世集刻本。
-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二百冊，北京：中華書局，1957，據北平圖書館影印本複製重印。
- 楊芳等纂修，《殿學要纂》四卷，收入《北圖珍本》41，據萬曆間刻本影印。
- 董秉純，《春雨樓初刪稿》十卷，收入《四明叢書》，民國二十五年（1936）刊本。
- 趙燏，《石墨鐫華》八卷，收入《知不足齋叢書》，乾隆三十九年（1774）刻本。

二・方志

- 嘉定《赤城志》四十卷，宋・黃耑、齊碩修，陳耆卿纂，嘉慶二十三年（1818）刊本。

張傳勇

- 咸淳《臨安志》一百卷，缺卷九〇、九八至一〇〇，宋·潛說友纂修，道光十年（1830）錢塘汪氏振綺堂刊本。
- 洪武《靖州志》不分卷，明·唐宗元纂修，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縮微膠片，據明抄本攝製。
- 成化《山西通志》十七卷，明·李侃修，胡謐纂，收入《四庫存目》史部 174，據民國二十二年（1933）影鈔明成化十一年（1475）刻本影印。
- 成化《杭州府志》六三卷首一卷，明·陳讓等修，夏時正等纂，收入《四庫存目》史部 175，據成化間刻本影印。
- 成化《河南總志》十九卷圖一卷，明·胡謐纂修，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縮微膠片，據成化二十二年（1486）刻本攝製。
- 成化《處州府志》十八卷首一卷，存卷三、四、七至十、一三至一八，明·郭忠修，劉宣纂，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縮微膠片，據成化二十二年刻本攝製。
- 弘治《八閩通志》八七卷，明·陳道修，黃仲昭纂，收入《四庫存目》史部 177-178，據弘治四年（1491）刻本影印。
- 弘治《岳州府志》十卷，明·劉璣纂修，收入《天一閣續編》63，據弘治元年（1488）刻本影印。
- 弘治《黃州府志》十卷，明·盧希哲纂修，收入《天一閣》53，據弘治十三年（1500）刻本影印。
- 弘治《衡山縣志》六卷，明·劉熙修，何紀纂，民國十三年（1924）康和聲鉛印周鏜續刻本。
- 弘治《徽州府志》十二卷，明·彭澤修，汪舜民纂，收入《天一閣》21-22，據弘治十五年（1502）刻本影印。
- 正德《福州府志》四十卷，明·葉溥修，張孟敬纂，福州：海風出版社，2001，整理本。
- 正德《瓊臺志》四四卷，存卷一至二一、二四至四三，明·唐胄纂修，收入《天一閣》60-61，據正德十六年（1521）刻本影印。
- 嘉靖《山東通志》四十卷，明·陸鉞等纂修，收入《四庫存目》史部 187-188，據嘉靖刻本影印。
- 嘉靖《太原縣志》六卷，明·高汝行纂修，收入《天一閣》8，據嘉靖三十年（1551）刻本影印。
- 嘉靖《吉安府志》卷數不詳，存卷五至一六，明·佚名纂，收入《北圖珍本》31，據嘉靖間刻本影印。
- 嘉靖《江西通志》三七卷，明·林庭棨修，周廣纂，收入《四庫存目》史部 182-183，據嘉靖四年（1525）刻本影印。

- 嘉靖《宜城縣志》三卷，明·吳廷璽纂修，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66，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據南京大學圖書館藏抄本影印。
- 嘉靖《河間府志》二八卷，明·郜相修，樊深纂，收入《天一閣》1-2，據嘉靖十九年（1540）刻本影印。
- 嘉靖《青州府志》十八卷，明·杜思修，馮惟訥纂，收入《天一閣》41-42，據嘉靖四十四年（1565）刻本影印。
- 嘉靖《南安府志》三五卷，明·劉節纂修，收入《天一閣續編》50，據嘉靖十五年（1536）刻本影印。
- 嘉靖《南康縣志》十三卷，明·劉昭文纂修，收入《天一閣續編》44，據嘉靖三十四年（1555）刻本影印。
- 嘉靖《南寧府志》十卷，存卷一至九，明·郭楠纂修，收入《天一閣續編》67，據嘉靖十七年（1538）刻本影印。
- 嘉靖《南寧府志》十一卷，明·方瑜纂修，收入《日本藏》，據嘉靖四十三年（1564）刻本影印。
- 嘉靖《宣平縣志》四卷，明·蕭彥修，鄭禧纂，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縮微膠片，據嘉靖二十五年（1546）刻本攝製。
- 嘉靖《恩縣志》九卷，明·林永昌修，張季霖纂，收入《上海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154，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據嘉靖十七年（1538）刻本影印。
- 嘉靖《陝西通志》四十卷，明·趙廷瑞修，馬理纂，收入《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1-5，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據嘉靖二十一年（1542）刻本影印。
- 嘉靖《惠州府志》十六卷，明·姚良弼修，楊宗甫纂，收入《天一閣》14，據嘉靖三十五年（1556）藍印本影印。
- 嘉靖《湖廣圖經志書》二十卷，明·薛綱纂修，吳廷舉續修，收入《日本藏》，據嘉靖元年（1522）刻本影印。
- 嘉靖《瑞安縣志》十卷，明·劉畿修，收入《稀見方志》18，據嘉靖三十四年刊本影印。
- 嘉靖《靖安縣志》六卷，明·趙公輔修，吳瑄纂，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縮微膠片，據嘉靖四十四年刻本攝製。
- 嘉靖《廣西通志》六十卷，明·林富修，黃佐纂，收入《四庫存目》史部 187，據嘉靖十年（1531）刻本影印。
- 嘉靖《廣東通志》七十卷，明·黃佐纂修，香港：大東圖書公司，1977，影印本。

張傳勇

嘉靖《潮州府志》八卷，明·郭春震纂修，收入《日本藏》，據嘉靖二十六年(1547)刻本影印。

嘉靖《澄城縣志》二卷，明·徐孝賢、敖佐修，石道立纂，咸豐元年(1851)重刻本。

嘉靖《興國州志》七卷，存卷二至七，明·唐寧修，林愛民纂，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縮微膠片，據嘉靖三十三年(1554)刻本攝製。

嘉靖《衡州府志》九卷，明·楊佩纂修，收入《天一閣》59，據嘉靖十五年刻本影印。

嘉靖《蘭陽縣志》十卷，明·褚宦修，李希程纂，收入《天一閣》52，據嘉靖二十四年(1545)刻本影印。

隆慶《岳州府志》十八卷，明·鍾寵文纂修，收入《天一閣》57，據隆慶間刻本影印。

萬曆《太平府志》三卷，明·蔡迎恩修，甘東陽纂，收入《日本藏》，據萬曆五年(1577)刻本影印。

萬曆《承天府志》二十卷，明·孫文龍纂修，收入《日本藏》，據萬曆三十年(1602)刻本影印。

萬曆《金華府志》三十卷，明·王懋德修，陸鳳儀纂，萬曆六年(1578)刻本。

萬曆《政和縣志》八卷，明·車鳴時纂修，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縮微膠片，據萬曆三十七年(1609)刻本攝製。

萬曆《重修南安府志》二五卷，明·商文昭修，盧洪夏等纂，收入《日本藏》，據萬曆刻本影印。

萬曆《栝蒼匯紀》十五卷，明·熊子臣修，何鏗纂，收入《四庫存目》史部193，據萬曆七年(1579)刻本影印。

萬曆《郴州志》二十卷，明·胡漢纂修，收入《天一閣》58，據萬曆四年(1576)刻本影印。

萬曆《新寧縣志》八卷，明·沈文系纂修，收入《日本藏》，據萬曆三十四年(1606)刻本影印。

萬曆《鄖陽府志》三一卷，明·周紹稷撰，收入劉兆祐主編，《中國史學叢書》三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據萬曆間刊本影印。

萬曆《福州府志》七六卷，明·喻政修，林經、謝肇淛纂，收入《日本藏》，據萬曆四十一年(1613)刻本影印。

萬曆《賓州志》十四卷，明·郭棐纂修，收入《日本藏》，據萬曆十五年(1587)刻本影印。

萬曆《濬縣志》不分卷，存上卷，明·李文昇纂修，萬曆八年(1580)刻本，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 萬曆《瓊州府志》十二卷，明·歐陽燦等修，陳于宸等纂，收入《日本藏》，據萬曆刻本影印。
- 崇禎《長樂縣志》十一卷，明·夏允彝纂修，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縮微膠片，據崇禎十四年(1641)刻本攝製。
- 崇禎《梧州府志》二十卷，明·謝君惠修，黃尚賢纂，清抄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 崇禎《義烏縣志》二十卷，明·周士英纂修，收入《稀見方志》17，據崇禎十三年(1640)刊本影印。
- 順治《宜君縣志》不分卷，清·佚名纂，清順治間抄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 順治《保安縣志》七卷，清·張嗣賢修，王政新纂，順治十八年(1661)抄本。
- 順治《陽山縣志》八卷，清·熊兆師纂修，順治十五年(1658)刻本。
- 順治《遠安縣志》八卷，清·安可願修，曾宗孔纂，順治十八年刻本。
- 順治《潮州府志》十二卷，清·吳穎，賀寬纂修，廣東省中山圖書館一九五七年油印本。
- 康熙《上猶縣志》十卷，清·章振萼纂修，收入《稀見方志》31，據康熙三十六年(1697)刊本影印。
- 康熙《五臺縣志》八卷首一卷，清·周三進纂修，收入《稀見方志》4，據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影印。
- 康熙《內鄉縣志》十二卷，清·寶鼎望修，高佑鈺纂，康熙三十二年(1693)刻本。
- 康熙《文昌縣志》十卷，清·馮日炳纂修，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點校本。
- 康熙《安鄉縣志》十二卷，清·王基鞏纂修，收入《日本藏》，據康熙二十六年刻本影印。
- 康熙《安慶府志》三二卷，清·張楷纂修，康熙六十年(1721)刻本。
- 康熙《西林縣志》不分卷，收入《稀見方志》49，據康熙五十七年(1718)刻本影印。
- 康熙《乳源縣志》八卷，清·張洗易纂修，收入《稀見方志》44，據康熙二十六年刻本影印。
- 康熙《京山縣志》十卷，清·吳游龍修，王演、盧前驥纂，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
- 康熙《和平縣志》八卷，清·唐開先纂修，韓師愈續修，龔以時續纂，收入《廣東歷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19，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9，據康熙抄本影印。
- 康熙《奉新縣志》十四卷，清·黃虞再修，閔鉞等纂，收入《上海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150，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據康熙元年(1662)刻本影印。

張傳勇

- 康熙《岳州府慈利縣志》四卷，清·胡公威修，葉瓊纂，康熙二十四年（1685）刻本。
- 康熙《武鄉縣志》六卷，清·高鉞修，宋蒼霖等纂，康熙三十一年（1692）刻本。
- 康熙《河間府志》二二卷，清·徐可先纂修，康熙十七年（1678）刻本。
- 康熙《長葛縣志》八卷，清·何鼎纂修，康熙三十年（1691）刻本。
- 康熙《青州府志》二二卷，清·陶錦修，王昌學、王檉纂，康熙六十年刻本。
- 康熙《青縣志》四卷，清·楊霞修，姚景圖纂，康熙十二年刻本。
- 康熙《信豐縣志》十二卷首一卷，清·張瀚修，黃彬等纂，收入《清代孤本方志選（第1輯）》19，北京：線裝書局，2001，據康熙五十八年（1719）刻本影印。
- 康熙《南安府志》二一卷，清·陳奕禧修，劉文爻纂，收入《清代孤本方志選》20-21，北京：線裝書局，2001，據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影印。
- 康熙《南寧府全志》不分卷，清·金先聲纂修，康熙抄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 康熙《英德縣志》五卷，存卷一、卷三至五，清·張斗、丘有璿纂修，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縮微膠片，據康熙十二年刻本攝製。
- 康熙《桂林府志》不分卷，清·程可則纂修，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縮微膠片，據康熙抄本攝製。
- 康熙《荔浦縣志》四卷，清·許之豫纂修，揚州書店一九七九年鈔康熙四十八年（1709）修鈔本。
- 康熙《盛京通志》三二卷，清·伊把漢、董秉忠等修，孫成等纂，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本。
- 康熙《通道縣志》二卷，清·殷道正纂修，康熙二十三年刻本。
- 康熙《連山縣志》十卷首一卷，清·劉允元修，彭鏜纂，康熙三十二年刻本。
- 康熙《郴州總志》十二卷，清·陳邦器修，李嗣泌、劉帶蕙纂，范廷謀增修，蔡來儀增纂，康熙五十八年增刻本。
- 康熙《麻城縣志》十卷，清·屈振奇修，王汝霖纂，康熙九年（1670）刻本。
- 康熙《滋陽縣志》四卷，清·李滌修，仲弘道等纂，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
- 康熙《紫陽縣新志》二卷，清·沈麟修，劉應秋纂，康熙二十七年（1688）刻本。
- 康熙《會同縣志》八卷，清·曹興隆修，唐文絢纂，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縮微膠片，據康熙間刻本攝製。
- 康熙《靖安縣志》八卷，清·高克藩修，舒其瑄纂，康熙三十二年刻本。
- 康熙《壽寧縣志》八卷，清·趙廷璣修，王錫卣等纂，康熙二十五年（1686）刻本。

- 康熙《寧化縣志》七卷，清·祝文郁修，李世熊纂，康熙二十三年刻本。
- 康熙《寧海縣志》十二卷首一卷，清·崔秉鏡修，華大琰纂，康熙十七年刻本。
- 康熙《寧鄉縣志》十卷首一卷，清·呂履恒纂修，康熙四十一年（1702）刻本。
- 康熙《靜海縣志》四卷，清·閻甲胤修，馬方伸纂，康熙十二年刻本。
- 康熙《鳳山縣志》十卷，清·李丕煜修，陳文達、李欽文纂，收入《臺灣文獻叢刊》124，臺北：臺灣銀行，1961。
- 康熙《廣昌縣志》六卷，清·王景昇修，魏宗衡纂，康熙二十二年（1683）刻本。
- 康熙《慶元縣志》十卷，清·程維伊修，吳運光等纂，康熙十一年刻本。
- 康熙《撫州府志》三五卷首一卷，清·劉玉瓚修，饒昌胤等纂，康熙四年（1665）刻本。
- 康熙《嶧縣志》五卷，清·劉允恭修，褚光鎮等纂，收入《孤本舊方志選編》6-7，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康熙二十四年（1685）刻本影印。
- 康熙《縉雲縣志》十卷，清·曹懋極纂修，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66，上海：上海書店，1993，據上海圖書館藏抄本影印。
- 康熙《遵化州志》十二卷，清·鄭僑生修，葉向昇等纂，收入《清代孤本方志選（第1輯）》1，北京：線裝書局，2001，據康熙間刻本影印。
- 康熙《鍾祥縣志》十卷首一卷，清·程起鵬修，鄭茂泰纂，康熙五年（1666）刻本。
- 康熙《灌陽縣志》十卷，清·單此藩修，蔣學元、陳廷藩纂，抄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 雍正《山東通志》三六卷首一卷，清·岳濬等修，杜詔等纂，收入《四庫全書》540。
- 雍正《宜君縣志》不分卷，清·查遜纂修，沈華訂正，雍正十年（1732）刻本。
- 雍正《岳陽縣志》十卷，清·趙溫修，常遜纂，雍正十二年（1734）刻本。
- 雍正《河南通志》八十卷，清·田文鏡等修，孫灝等纂，收入《四庫全書》535-538。
- 雍正《浙江通志》二八〇卷首三卷，清·李衛、嵇曾筠等修，沈翼機、傅王露等纂，收入《四庫全書》519-526。
- 雍正《湖廣通志》一二〇卷首一卷，清·邁桂修，夏力恕纂，收入《四庫全書》531-534。
- 雍正《廣西通志》一二八卷，清·金鉞修，錢元昌、陸綸纂，收入《四庫全書》565-568。
- 雍正《廣東通志》六四卷，清·郝玉麟修，魯曾煜等纂，收入《四庫全書》562-564。

張傳勇

- 乾隆《五臺縣志》八卷，清·王秉韜纂修，乾隆四十五年 (1780) 刻本。
- 乾隆《吉安府志》七四卷首一卷，清·盧崧修，朱承煦、林有席纂，乾隆四十一年 (1776) 刻本。
- 乾隆《岑溪縣志》四卷，清·何夢瑤纂修，劉廷棟續纂，民國二十三年 (1934) 鉛印本。
- 乾隆《辰州府志》五十卷首一卷，清·席紹葆等修，謝鳴謙、謝鳴盛纂，乾隆三十年 (1765) 刻本。
- 乾隆《和平縣志》八卷，清·曹鵬翊、徐廷芳修，朱超玖、徐潤纂，乾隆二十八年 (1763) 刻本。
- 乾隆《長葛縣志》十卷，清·阮景咸修，李秀生等纂，乾隆十二年 (1747) 刻本。
- 乾隆《重修鳳山縣志》十二卷，清·王瑛曾纂修，收入《臺灣文獻叢刊》146，臺北：臺灣銀行，1962。
- 乾隆《桂陽縣志》十三卷，清·凌魚、黃文理修，朱有斐、李宗纂，嘉慶七年 (1802) 增刻本。
- 乾隆《崇陽縣志》十卷，清·黃袞修，郭彥博纂，乾隆六年 (1741) 刻本。
- 乾隆《開化縣志》十二卷首一卷，清·范玉衡修，吳淦等纂，乾隆六十年 (1795) 刻本。
- 乾隆《僊遊縣志》五三卷首一卷，清·胡啟植、王椿修，葉和侃等纂，同治十二年 (1873) 刻本。
- 乾隆《嵩縣志》三十卷首一卷，清·康基淵纂修，乾隆三十二年 (1767) 刊本。
- 乾隆《新蔡縣志》十卷，清·莫璽章修，王增纂，乾隆六十年刻本。
- 乾隆《新輯閩清縣志》十卷，清·姚循義纂修，收入《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府志叢刊》14，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據館藏抄本影印。
- 乾隆《鄖西縣志》二十卷首一卷，清·張道南纂修，乾隆四十二年 (1777) 刻本。
- 乾隆《潯州府志》五十卷首一卷，清·胡南藩修，歐陽達纂，乾隆二十一年 (1756) 刻本。
- 乾隆《澄城縣志》二十卷，清·戴治修，洪亮吉、孫星衍纂，乾隆四十九年 (1784) 刻本。
- 乾隆《膠州志》八卷首一卷，清·周於智修，劉恬纂，乾隆十七年 (1752) 刻本。
- 乾隆《澠池縣志》三卷，清·梁易簡修，劉元善纂，乾隆十一年 (1746) 刻本。
- 乾隆《興國縣志》二六卷首一卷，清·孔興浙修，孔衍倬纂，乾隆十五年 (1750) 刻本。

- 乾隆《龍泉縣志》二十卷首一卷末一卷，清·杜一鴻修，周壘纂，乾隆三十六年(1771)刻本。
- 乾隆《鍾祥縣志》十卷，清·高世榮修，李蓮纂，乾隆六年刻本。
- 乾隆《鬱林州志》十卷，清·邱桂山修，劉玉麟、秦兆鯨纂，乾隆五十七年(1792)刻本。
- 嘉慶《重修慈利縣志》八卷首一卷，清·李約修，皇甫如森纂，嘉慶二十二年(1817)刻本。
- 嘉慶《義烏縣志》二二卷首一卷，清·諸自毅修，程瑜、李錫齡纂，嘉慶七年刻本。
- 嘉慶《鄖陽志》十卷首一卷，清·王正常修，謝攀雲纂，嘉慶二年(1797)刻本。
- 嘉慶《廣西通志》二七九卷首一卷，清·謝啟昆修，胡虔纂，嘉慶六年(1801)刻本。
- 嘉慶《濬縣志》二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清·熊象階修，武穆淳纂，嘉慶七年刻本。
- 嘉慶《續修興業縣志》十卷首一卷，清·蘇勒通阿修，彭焜基、龐錫綸纂，民國抄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 道光《上思州志》二十卷首一卷，清·陳蘭滋纂修，道光十四年(1834)刻本。
- 道光《平南縣志》二二卷首一卷，清·張顯相修，黎士華纂，道光十五年(1835)刻本。
- 道光《宣平縣志》十八卷首一卷，清·湯金策修，俞宗煥纂，道光二十年(1840)刻本。
- 道光《英德縣志》十六卷首一卷，清·黃培燦、劉濟寬修，陸殿邦纂，道光二十三年(1843)刻本。
- 道光《重修膠州志》四十卷，清·張同聲修，李圖等纂，道光二十五年(1845)刻本。
- 道光《寧陝廳志》四卷，清·林一銘修，焦世官、胡官清纂，道光九年(1829)刻本。
- 道光《福建通志》二七八卷首七卷，清·孫爾準等修，陳壽祺纂，程祖洛等續修，魏敬中續纂，同治十年(1871)正誼書院刻本。
- 道光《衡山縣志》五五卷首一卷，清·侯鈐、張富業修，張孝齡、蕭鳳翥纂，道光三年(1823)增刻本。
- 咸豐《保安縣志》八卷，清·彭瑞麟修，武旭東纂，咸豐六年(1856)刻本。
- 咸豐《澄城縣志》三十卷，清·金玉麟修，韓亞熊纂，咸豐元年刻本。
- 同治《大邑縣志》二十卷，清·趙霽等纂修，同治六年(1867)刻本。

張傳勇

同治《永豐縣志》四十卷，清·雙貴、王建中修，劉繹等纂，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同治《永綏直隸廳志》六卷，清·周玉衡等修，楊瑞珍纂，同治七年（1868）刻本。

同治《宜城縣志》十卷，清·程啟安修，張炳鐘、魯裔曾纂，同治五年（1866）刻本。

同治《茶陵州志》二四卷，清·福昌修，譚鍾麟纂，民國二十二年增刻本。

同治《崇陽縣志》十二卷首一卷，清·高佐廷修，傅燮鼎纂，同治五年刻本。

同治《鄖西縣志》二十卷首一卷，清·程光第修，葉年棻、李登鰲纂，同治五年刻本。

同治《鉛山縣志》三十卷首一卷，清·張廷珩修，華祝三纂，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

同治《靖安縣志》十六卷首一卷，清·徐家瀛修，舒孔恂纂，清同治九年（1870）活字本。

同治《遠安縣志》八卷首一卷，清·鄭燁林修，周葆恩纂，同治五年刻本。

同治《潯州府志》三八卷首一卷，清·魏篤修，王俊臣纂，同治十三年刻本。

同治《臨川縣志》五四卷首一卷末一卷，清·童範儼修，陳慶齡等纂，同治九年刻本。

光緒《五臺新志》四卷首一卷，清·徐繼畬纂修，孫汝明、王步墀續修，楊篤續纂，光緒九年（1883）續修刻本。

光緒《巴陵縣志》六三卷首一卷，清·姚詩德、鄭桂星修，杜貴墀等纂，光緒十七年（1891）刻本。

光緒《北流縣志》二四卷，清·徐作梅等修，李士琨等纂，光緒六年（1880）刻本。

光緒《永興縣志》五五卷首一卷，清·呂鳳藻修，李獻君纂，光緒九年刻本。

光緒《吉安府志》五三卷首一卷，清·定祥、特克紳布修，劉繹、周立瀛纂，光緒二年（1876）刻本。

光緒《佛坪廳志》二卷首一卷，清·劉煥纂修，光緒九年刻本。

光緒《良鄉縣志》八卷，清·陳帽、范履福修，黃儒荃纂，光緒十五年（1889）刻本。

光緒《益都縣圖志》五四卷首一卷，清·張承燮修，法偉堂等纂，光緒三十三年（1907）刻本。

光緒《常山縣志》六八卷首一卷末一卷，清·李瑞鍾修，朱昌泰等纂，光緒十二年（1886）刻本。

- 光緒《僊居志》二四卷首一卷，清·王壽頤、潘紀恩修，王棻、李仲昭纂，光緒二十年 (1894) 活字本。
- 光緒《靖州直隸州志》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清·吳起鳳、勞銘勳修，唐際虞、李廷森纂，光緒五年 (1879) 刻本。
- 光緒《寧明州志》二卷，清·王炳紳修，黎申產纂，民國三年 (1914) 鉛印本。
- 光緒《賓州志》二四卷，清·耿省修，張鵬展纂，楊椿增修，陸生蘭增纂，光緒十二年刻本。
- 光緒《興國州志》三六卷首一卷，清·吳大訓等修，陳光亨纂，劉鳳綸、王鳳池續纂，光緒十五年刻本。
- 光緒《衡山縣志》四五卷首一卷，清·李惟丙、勞銘勳修，文嶽英、胡伯第纂，光緒九年增刻本。
- 光緒《臨朐縣志》十六卷首一卷，清·姚延福修，鄧嘉緝、蔣師轍纂，光緒十年 (1884) 刻本。
- 宣統《永綏廳志》三十卷首一卷，清·董鴻勳纂修，宣統元年 (1909) 鉛印本。
- 宣統《涇陽縣志》十六卷首一卷末一卷，清·劉懋官修，宋伯魯等纂，宣統三年 (1911) 鉛印本。
- 民國《上思縣志》六卷，黃大受修，黃步青纂，民國四年 (1915) 鉛印本。
- 民國《永福縣志》四卷，清·林光棣原本，民國·劉興增修，李驥年增纂，民國六年 (1917) 刻本。
- 民國《和平縣志》二十卷首一卷，曾樞修，凌開蔚纂，民國三十二年 (1943) 鉛印本。
- 民國《青縣志》十六卷首一卷，萬震霄修，高遵章、姚維錦纂，民國二十年 (1931) 鉛印本。
- 民國《政和縣志》三五卷首一卷末一卷，錢鴻文、黃體震修，李熙等纂，民國八年 (1919) 鉛印本。
- 民國《荔浦縣志》四卷，顧英明修，曹駿纂，荔浦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一九九三年點校本。
- 民國《莆田縣志》四十卷，石有紀修，張琴纂，《中國地方志集成·福建府縣志輯》16-17，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據民國抄本影印。
- 民國《連山縣志》十六卷首一卷，何一鸞修，臧承宣纂，凌錫華增修，民國十七年 (1928) 增修鉛印本。
- 民國《陸川縣志》二四卷首一卷末一卷，古濟勳修，呂濬堃、范晉藩纂，民國十三年 (1924) 刻本。
- 民國《紫陽縣志》六卷首一卷，楊家駒修，陳振紀、陳如壩纂，民國十四年 (1925) 石印本。

張傳勇

民國《瑞安縣志稿》不分卷，瑞安縣修志委員會纂，民國二十七年（1938）鉛印本。

民國《賓陽縣志》八編，賓陽縣文獻委員會纂修，廣西僑族自治區檔案館一九六一年鉛印本。

民國《閩清縣志》八卷首一卷，楊宗彩修，劉訓瑞纂，民國十年（1921）鉛印本。

民國《樂昌縣志》二二卷首一卷，劉運鋒修，陳宗瀛纂，民國二十年鉛印本。

民國《澄城縣附志》十五卷首一卷，王懷斌修，姬新命纂，民國十五年（1926）鉛印本。

民國《鞏縣志》二六卷首一卷，楊保東、王國璋修，劉蓮青、張仲友纂，民國二十六年（1937）刻本。

民國《澠池縣志》二十卷，陸紹治修，李鳳翔、上官駿謨纂，民國十七年石印本。

民國《臨朐續志》二二卷，周鈞英修，劉仞千纂，民國二十四年（1935）鉛印本。

民國《歸綏縣志》不分卷，鄭植昌修，鄭裕孚纂，民國二十三年（1934）鉛印本。

民國《廬陵縣志》二八卷首一卷末一卷，王補、曾燦材纂，民國九年（1920）刻本。

民國《續修歷城縣志》五四卷，毛承霖纂修，民國十五年鉛印本。

方拱乾，《寧古塔志》，收入《昭代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馬蓉等點校，《永樂大典方志輯佚》，北京：中華書局，2004。

張國淦，《永樂大典方志輯本》，收入《張國淦文集四編》，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龔輝，《全陝政要》四卷，收入《四庫存目》史部 188，據嘉靖刻本影印。

三·近人論著

巴兆祥

2004 〈論明代方志的數量與修志制度——兼答張昇《明代地方志質疑》〉，《中國地方志》2004.4：45-51。

申浩

2008 〈明清民間信仰視域中的江南社會〉，《徐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2：66-70。

- 白庚勝主編
2010 《中國民間故事全書·河北固安卷》，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
- 成一農
2004 〈宋、元以及明代前中期城市城牆政策的演變及其原因〉，中村圭爾、辛德勇主編，《中日古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145-183。
2009 《古代城市形態研究方法新探》，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0 〈中國古代地方城市形態研究現狀評述〉，《中國史研究》2010.1：145-172。
- 李孝聰
2006 〈明、清時期地方城市形態試析〉，武漢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編，《石泉先生九十誕辰紀念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頁 496-536。
- 李秋芳
2010 〈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及其史料價值〉，《史學史研究》2010.4：112-117。
- 李美山
1987 〈昔日的古城鐵廠〉，政協河北省遵化縣委員會編，《遵化史話（第4輯）》，遵化：遵化縣印刷廠，頁 132-138。
- 李裕民
1985 〈洪武《太原志》研究〉，《城市改革理論研究》1985.1：66-72。
- 孟文筠
2004 〈明代以來城隍故事與信仰〉，花蓮：花蓮師範學院民間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佩諭
2002 〈鳳山縣舊城及周遭聚落變遷之研究（1661-1970）〉，臺南：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
- 施賴奧克 (John Knight Shryock) 著，程曦譯
2008 《近代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安慶的寺廟及其崇拜》，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
- 徐泓
1999 〈明代福建的築城運動〉，《暨大學報》3.3：25-76。
- 宿白
1999 〈青州城考略〉，《文物》1999.8：51-53。

張傳勇

張傳勇

- 2004 〈明清山東城隍廟「異例」考〉，《聊城大學學報》2004.6：48-54。
- 2006 〈附郭城隍廟考〉，《世界宗教研究》2006.1：63-71。
- 2010 〈明清陝西城隍考——堡寨與村鎮城隍廟的建置〉，常建華主編，《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11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頁62-83。

章生道

- 2000 〈城治的形態與結構研究〉，施堅雅主編，葉光庭等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北京：中華書局，頁84-111。

許衛平

- 2002 《中國近代方志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陳正祥

- 1982 《中國文化地理》，香港：三聯書店。

陳全智、劉慶昭

- 1983 〈鞏縣老城示意圖說明〉，鞏縣志編纂委員會總編輯室編，《鞏縣文史資料（第9輯）》，內部資料，頁1-5。

費文中

- 2005 〈城隍廟的故事〉，俞惕生、俞怡生主編，《冠蓋里：江西鉛山費氏科第世家尋蹤》，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頁119-121。

黃燕生

- 1988 〈《永樂大典》地圖考錄〉，《文獻》1988.4：145-164。

雷聞

- 2009 《郊廟之外：隋唐國家祭祀與宗教》，北京：三聯書店。

劉景純

- 2005 〈清代黃土高原地區城鎮宗教祭祀景觀的分佈特徵〉，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編，《歷史環境與文明演進——2004年歷史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275-284。

鄭利峰

- 2009 〈宋代地方志南北修撰異同論〉，《史學史研究》2009.2：101-110。

魯西奇

- 2011 《城牆內外：古代漢水流域城市的形態與空間結構》，北京：中華書局。

魯西奇、馬劍

- 2009 〈城牆內的城市？——中國古代治所城市形態的再認識〉，《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9.2：7-16。

顧宏義

- 2010 《宋朝方志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金元方志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顧希佳

- 1998 〈浙江蕭山小城隍廟考〉，《民俗曲藝》114：59-82。
2000 〈「攆城隍型」故事的比較研究〉，《杭州師範學院學報》2000.5：99-103。後以〈凡夫俗子攆城隍——「攆城隍」故事解析〉為題，收入劉守華主編，《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 272-287。

濱島敦俊著，沈中琦譯

- 1991 〈明清江南城隍考——商品經濟的發達與農民信仰〉，《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1：39-48。原文〈明清江南城隍考〉，唐代史研究會編，《中国都市の歴史的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88，頁 218-231。

濱島敦俊、顧希佳

- 1999 〈浙江省蕭山縣小城隍廟調查報告——城隍廟覺書（一）〉，《大阪大學文學部紀要》39：47-74。後收入濱島敦俊著，《總管信仰——近世江南農村社会と民間信仰》，東京：研文出版，2001；中譯本：朱海濱譯，《明清江南農村社會與民間信仰》，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

張傳勇

A Study on the City-God Temples Built Outside of the City Walls

Chuan-yong Zhang

College of History & Center for Chinese Social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In the traditional beliefs, whether it is worshipped as a protective god of the city or as an official of the underworld, city-god temples should be built within the city walls, and city-god temples built outside the wall were often regarded as abnormalities. However, in actual practices, such a strict relationship did not exist between city-god temples and the city walls. City-god temples, which began to be established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were built inside walled cities as well as at other places. Utilizing historical documents, mainly local gazetteers, and scrutinizing a larger geographical area, we find that the temples built outside of the city walls present a lot of new meanings beyond our conventional understanding.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ndition of these outside templ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 As city-god temples constitute one of the main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ities, where they were built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to the history of city-wall building. The notion of outside temples would not exist if there was no wall. The changes of city walls could be a major factor leading to the emergence or termination of the outside temple, but there was no definite correlation. More importantly, there were far less of these outside temples than walled cities. Therefore, only in some particular regions, we are able to find a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ity's changes and the appearance of the outside temples, where the outside temples more or less reflect the changes in the local community. However, it is hard to find a general pattern.

Keywords: city wall, city-god temple, protective god of the city, the underworld official